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邱坤玄 博士



中國大陸文化安全的建構

研究生：張竣程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

## 摘要

中共中央於 2006 年 10 月 11 日第 16 屆 6 中全會中，通過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其目的，表面上是在有系統化地規劃出「和諧社會」的理論、圖像與願景，從而提出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戰略思路。但實際的目的，除了是在建構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實踐型意識形態，確定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工作重點之外，最主要的是要在解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造成的社會矛盾、「社會不和諧」，並從經濟建設為唯一核心走向突出社會建設，以因應改革開放以來所產生的各種「失衡」與社會矛盾擴大，維持大陸的社會穩定。

對此中共中央早於 2004 年第 16 屆 4 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除具體列出中國大陸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即當前社會「不和諧」的主要矛盾外，並將「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與「資訊安全」，列為當前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管理之四大支柱。為什麼「文化安全」於當前之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管理中，有如此突出的角色地位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管理」的內在性質，以及前揭戰略環境變化所引致的中共對其國家安全弱點與缺口的新的新戰略憂慮，兩相交疊的結果。

前揭《決定》中所提出的大陸社會當前諸多「不和諧」問題，表面上是分別屬於經濟、社會發展政策，以及在大陸隸屬於行政管理（國務院）範疇的法制建設、行政監察（反腐敗鬥爭）、社會教育、反滲透（安全情報）等事務性工作，但實際上，中共在此是以精神導引面向的「意識形態鬥爭」之戰略高度，將之做政策概括。透過此《決定》所新形成的戰略管理架構是：對外反制導引社會不穩定的「和平演變」因素，對內則重新向人民「畫大餅」——更系統化地規劃出中共做為「現代化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社會」之理論、圖像與願景，爭取政治認同。並以「文化安全」的機制運作，做為此項國家安全戰略管理的主軸。為何「文化安全」是中共此一新「意識形態鬥爭」戰略部署的核心呢？這與「文化安全」的「軟實力」本質直接相關。文化的「軟實力」性質，主要是相對於硬實力而言的。因為文化具有引導、激勵、凝聚等功能，對社會大眾可以「起著『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作用，發展文化軟實力不能依靠強制或者行政命令，那樣就違背了文化軟實力的發展規律。」故中共對其「文化安全」的把握，才是其

把握此一新波「意識形態鬥爭」的前提。

綜合而言，「文化安全」的相關政策作為，對於當今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其主要原因是中共政權的外在環境（經濟全球化、資訊化科技革命、國際格局變遷等），與上述內在環境之變化交互影響、交互作用的結果。



**關鍵字：軟實力，文化安全，文化戰略**

# 目 錄

摘要.....	i
目錄	iii
<b>第一章 緒論</b>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10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12
<b>第二章 中共文化安全的理論基礎</b>	14
第一節 中共的國家安全取向	14
第二節 文化安全之內涵與特徵	17
第三節 中共的文化安全戰略概念	21
第四節 國家安全與文化安全關係	26
<b>第三章 中共文化安全政策的機制與管理</b>	31
第一節 中共文化安全的政策	31
第二節 中共文化安全的機制架構	39
第三節 中共文化安全的決策機構與決策行為者	48
<b>第四章 中共文化安全的戰略架構</b>	57
第一節 導引社會思想	57
第二節 對「文化軟實力」之競爭進行戰略管制	66
第三節 傳播媒體之管制	74
第四節 對台文化安全之戰略管理	79
<b>第五章 結論</b>	89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9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94
<b>參考文獻</b>	101

# 第壹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壹、研究動機

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條件。文化的生存狀態不僅積澱著一個民族和國家過去的全部智慧和文明成果，而且還蘊含著它走向未來的一切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基因，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全部價值與合理性之所在。因此，一旦這種文化遭遇威脅和侵略，則必然要給民族和國家帶來深刻的文化危機和民族危機，從而也就構成了國家文化安全的全部內容和意義。進入新的世紀，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世界各個角落，而美國做為全球化的一個「滋生物」、「怪胎」和「陷阱」，成為資本掠奪的一種新的當代形態，並直接威脅著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作為重要的國家議程，成為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國家共同的行為邏輯。在當前英語媒體壟斷全球傳媒市場，廣大發展中國家文化入超嚴重的現狀下，英語文化正在侵入其他民族語言的文化領地。全世界 6800 多個語種中有 40% 的語種所代表的文化正面臨著生存危機。<sup>1</sup>發展中國家從本土文化受到侵蝕出發，批判自不待言，然而世界最大的文化出口國美國仍然感到文化不安全，也時時發出西方文化走向衰落的預言，這就值得反思了。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到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西方學者不斷以超前的眼光批判西方文化正在被東方文化「新陳代謝」，揣測東方文化可能取而代之而對其構成的威脅。除了一貫執行的海外文化市場開拓以外，911 之後，美國更是感受到國際形象下滑帶來的危機，繼而開展了一系列「文化復興計畫」；<sup>2</sup>法國是處於西方文化體系中的歐洲強國，面對美國文化的擴散，法國也認為自己不安全，繼而構建了以保護法語純潔性為核心的法蘭西文化振興體系；東方國家韓國、日本更認為自己不安全，由此誕生了日本漫畫產業和韓劇、日劇向世界

---

<sup>1</sup>David Harrison, Geographic Magazine, Oct.2007.

<sup>2</sup>911 後，美國政府為應對恐怖主義行動和反美主義情緒，制定了一個通過文化外交改善國際形象的「文化復興計畫」，成立於 2003 年 7 月的美國國務院文化外交諮詢委員會是該計畫的執行機構。

的廣泛傳播；和平崛起中的中國同樣感受到了不安全，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發展，成為儒家文化復興和中國軟實力戰略的一部分。正是由於這種「普遍不安全感」的存在，處於世界文化格局不同位置的國家在文化安全的維護上體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而要實現國家的文化安全，「不單在於要造就一種安全的現狀，還要造就一種安全的心態」。

然而，在判斷本國文化是否安全時，民族國家卻往往會陷入認知的困境，這裡，文化「安全」與「不安全」的界限難以分辨。

以當前的文化現象為例，美國好萊塢電影為什麼在英國人看來是大眾文化的「自由流動」，而在許多國家看來是「文化入侵」？印度寶萊塢電影對整個印度次大陸甚至中東國家影響深遠，卻為何沒有像美國文化在中東地區引起「文化衝突」？韓劇、日劇的影響力在亞洲地區正日益與美國影視劇抗衡，又為何沒有引起亞洲國家「文化入侵」的恐懼？拋開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因素的影響，在認知層面上，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與「安全」概念本身的複雜性有關。

## 貳、研究目的

當今，以文化為核心內涵的「軟實力」競爭已經構成國際政治博弈的一個重要戰略「制高點」。面對著文化在世界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的現實，中國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著力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對內在不斷地提高國家文化原創能力，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對外還必須積極、主動地開展文化交流與交往。惟此，才能為國家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安全環境。

中國將文化安全當作非傳統安全問題來看待，並將其納入國家總體安全戰略之中肇始於 2002 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在這次大會上，中共一改過往只注重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為核心的傳統安全因素的觀念和做法，形成了既包括傳統安全又包括經濟安全、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在內的「綜合安全觀」，提出了「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的提法。2004 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則在對中國當時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因素進行深入分析的同時，又對非傳統安全的內涵做了具體而詳細的闡述，明確

提出要「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資訊安全」。<sup>3</sup>

眾所周知，「軟權力」概念最早由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哈佛大學教授喬瑟夫·奈伊所提出，意指「在國際事務中運用媚惑代替脅迫實現所渴望結果的能力。」奈伊指出，「要把軟權力看作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戰爭所能運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絕不能低估軟權力在國際機制和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作用！」<sup>4</sup>。對於「全球化」，特別是「美國化」的文化霸權力量入侵，中共學界體會尤深，並將其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視其為嚴峻的危機。

關於此節，中共過去動輒以「對外宣傳」因應之，且自三〇年代以降的對外宣傳績效，認為充當喉舌的共產黨宣傳工具，當可以發揮「細雨潤無聲」的功能，透過強勢作為進行之，這種類似傳播學的注射論作法，但究其實質，只是一種「內外有別」的策略操作。面對全球化大幅擠壓空間與時間的畛域，中共過去宣傳的單一維度（single dimension）的理論與作為，早就在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場域裡被逐步拆解。中共在對外宣傳的環節上，必須發展出一套攻守兼具的理論、戰略與體系，才能因應紛沓而來的挑戰。

有鑑於此，中共學界近年發展出「文化安全」的理論，除受到中國大陸政府的高度重視。在政策上，2006年中共頒佈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已經將「文化安全」提升到國家利益的戰略高度，且成為組成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同時，也被中共列為「國家社科基金『十五』規劃項目」以及「國家『211工程』建設重點項目」。

事實上，「文化安全」研究對於台灣學界而言，是一個較為陌生的領域。原因在於此節涵蓋中國大陸區域研究、政治學與傳播學等面向，卻又不屬於這些面向的核心要目。但此節攸關中國大陸的國家基本利益、國家戰略走向甚鉅，影響也十分深遠。期能深究其義，掌握其變遷發展的脈絡，以利政府及相關部門妥為因應。因此，本研究預期目的的主要如下：

#### 一、釐清安全、國家安全與文化安全三者的脈絡與定義。

<sup>3</sup>中央文獻出版社。《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89-290。

<sup>4</sup>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2002, p176.

- 二、釐清中國大陸學界是如何逐步建構文化安全。
- 三、釐清中國大陸文化安全是透過何種途徑進行建構。
- 四、釐清中國大陸建構文化安全的效益及可能威脅為何？
- 五、提出對於中國大陸文化安全的建議與評析。

##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全球化是討論當代中國一切的問題和基礎。這不僅是因為全球化作為一種語境，正在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我們思考問題的維度，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正影響著人類歷史改變的進程<sup>5</sup>。全球化作為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改變世界的經濟結構，也深刻地影響世界上的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在全球化時代裡，一個國家的力量不再侷限於單項的國家實力，文化成為人類社會財富創造的嶄新型態，同時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之一，而文化國力作為軟實力（soft power）已經成為國際力量平衡的重要因素。美國學者 Nye 提出將國家實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大類的觀點，「硬實力」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科技力量等；至於「軟實力」，則是具有彈性的實力，包括國家凝聚力、文化普遍被接受的程度等，從而使文化成為評估綜合國力的重要價值體系。<sup>6</sup>

文化並不是虛無的單純精神力量，它滲透於經濟組織和社會結構中，發揮著動員、協調、調動、組織國力或者是蠱惑人心、渙散國力的作用。通常情況下，當一個國家的民眾對主權國家的政治合法性有比較一致的認同感時，該國家的政治體系就處於比較良性的運作狀態。反之，當一個國家的民眾對主權國家政治合法性持懷疑的態度，國內的政治環境就會惡化並產生社會動盪，進而危及國家安全。<sup>7</sup>

由於認識此節的重要性及迫切性，2004 年中共第十六屆四中全會確定，將「文化安全」列為國家四大安全之一。《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

<sup>5</sup>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sup>6</sup>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2002, p176。

<sup>7</sup>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6）。2007 年，頁 53。

指出：<sup>8</sup>

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安全。針對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關係相互交織的新情況，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完善國家安全戰略，抓緊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科學、協調、高效的工作機制。堅決防範和打擊各種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有效防範和應對來自國際經濟領域的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 and 信息安全。

顯見，中共當局除意識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外，並將文化安全列為國家的重大問題來安排和部署，以確保中共得以取得明確控制權。<sup>9</sup>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體認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漸出現的五大隱憂。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文化滲透愈演愈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有計畫的進行滲透、分化，公開性與隱蔽性相結合，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多手法的進行滲透。<sup>10</sup>

其次是網際網路成為西方文化滲透的主要工具及載體，西方發達國家憑藉佔據著信息傳播的制高點，利用即時聊天工具、電子郵件、網路論壇、線上廣播、線上電視、電影以及電子商務等散佈各種詆毀、顛覆中國政權的信息，傳播煽動性、破壞性言論和政治謠言，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中國民眾的文化思維和價值判斷；第三則是青年人、三失群體是西方文化滲透的主要對象。<sup>11</sup>這些西方國家針對三失群體急於尋求安慰及解脫的困境，利用傳媒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經濟發展、和人權狀況等大肆抨擊，憑藉已宣揚多年的「自由民主」意識，對一些民眾進行反政府煽動，並給以廣泛的同情和輿論支持，對他們進行滲透。最後則是地下非法文化組織活動有所蔓延，但盜版、盜錄層出不窮；以及影響社會穩定的不良思潮，諸如迷信、邪教與黃賭毒之類。<sup>12</sup>

目前，中共學者對於文化安全內涵的界定尚未達成共識。其中比較有代表性

---

<sup>8</sup>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6/content\\_20242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6/content_2024232.htm)。（閱覽日期：2013.3.5）

<sup>9</sup>王佐書。《中國文化戰略與安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sup>10</sup>長子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隱憂〉。《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31(1)。2008年，頁82。

<sup>11</sup>所謂「三失群體」指的是中共的圍有企業改制、重組、破產等所引發的職工下崗失業、農村土地徵用所造成的農民失地、城市房屋拆遷所形成的居民失房的三大弱勢群體。

<sup>12</sup>長子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隱憂〉。《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08年，頁82-83。

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包括：<sup>13</sup>

一是主權論：胡惠林以系統整體的觀念對文化安全進行了界定，<sup>14</sup>指出國家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的文化主權神聖不可侵犯，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發展選擇必須得到尊重，包括國家的文化立法權、文化管理權、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選擇權、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獨立自主權，是國家文化生存免於威脅或危險的狀態。

二是價值論：林宏宇認為文化安全是指本國文化的精神形態不受別國不良文化形態的影響與傷害，保持本國文化固有的繼承性與民族性。<sup>15</sup>欣榮則認為文化安全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主流文化價值體系，<sup>16</sup>免於遭受來自內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蝕、破壞或顛覆，以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價值系統。

三是功能論：林寧側重綜合功能，<sup>17</sup>指出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能夠獨立自主地選擇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抵制其他國家試圖以意識形態的政治、經濟、民主模式強加予本國的做法，防範其他國家對本國人民文化生活的滲透、保護本國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制度，保持文化的民族性，維護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並通過國家文化交流擴大本國文化的影響。

另陳筑君認為，<sup>18</sup>軟權力是指一個國家透過該國具有吸引他國的特性的文化、政治的價值觀、外交政策的正當性、有道德的說服力來形塑、感動、模仿，甚至同化他國的一種能力；文化軟權力是指通過該國的文化 and 意識形態的魅力來潛移默化他國的一種無形力量。文化軟權力是軟權力中的組成部份之一，作為軟權力中的文化因素對於當前硬權力持續發展的中國來說，是亟需重視的一個課題，目前中國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外部受到西方價值輸入、文化霸權擴張、加入 WTO 挑戰的影響；內部則有傳統文化破壞、意識型態分歧、多元意見控管等因素。在因應對策方面，大致包括：文化創新、文化體制改革、積極創造文化產業、發展傳播媒體事業、制定有效的文化安全管理機制，並從戰略的高度位置擬定文化大國戰略。至於尚待克服的文化安全問題則有：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問題

---

<sup>13</sup>解學芳。〈一個全心的學術研究領域：國家文化安全〉。《高校社科動態》，(2)。2007年，頁16。

<sup>14</sup>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sup>15</sup>林宏宇。〈文化安全：國家安全的深層主題〉，《國家安全通訊》，(3)。1999年，頁12-13。

<sup>16</sup>欣榮。〈建立文化安全體系捍衛我國的文化安全〉。《國家安全通訊》，(3)。2002年，頁16-18。

<sup>17</sup>林寧。〈關注文化安全加強先進文化建設的思考〉。《理論月刊》，(6)。2004年，頁23-26。

<http://scholar.ilib.cn/A-QCode~aq200502003.html> (閱覽日期：2013.3.5)

<sup>18</sup>陳筑君。《中國的文化安全問題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題、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多族群的國家文化認同的問題、農村文化建設的問題、腐朽文化氾濫的問題、網路負面危害的問題、文化主權弱化的問題等。

程美信指出，<sup>19</sup>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除了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外，必須在思想哲學、文化藝術、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等軟系統方面具有引領地位。中國學術界文化人士一直呼籲政府大量發展國家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文化產品和思想觀念的對外輸出。惟當前的漢語熱和孔子學院能夠四處掛牌，它仍無法挽救傳統文化和漢語文字悄然死去的客觀事實。此外，不論是解決中國自身文化矛盾和向世界輸出中國人的思想，絕不可在過往經驗中找到有效處方，而是要通過創造力作為歷史開源的新動力。

胡惠林則認為，<sup>20</sup>國家文化軟實力來自於民眾對社會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的認同，具體表現為國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凝聚力。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是通過該國國民的整體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所達到的自由和文明程度體現出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有成為民眾的自覺行為方式和融會於民眾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價值選擇與表達，才能成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所需要的凝聚力量。衡量這一程度的標準是民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在憲法的框架下實現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是實現每個個體自由全面發展的文化民權保障，並構成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基礎和價值取向。

張殿軍、鄭興剛認為當今時代，<sup>21</sup>以文化為核心內涵的「軟實力」競爭已經構成國際政治博弈的一個重要戰略「制高點」。面對著文化在世界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的現實，中國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著力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對內在不斷地提高國家文化原創能力，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對外還必須積極、主動地開展文化交流與交往。惟此，才能為國家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安全環境。

師英傑認為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sup>22</sup>不僅要有硬實力的支撐，

---

<sup>19</sup>程美信。〈思想貧困的文化戰略----從孔子學院看中國軟實力〉。2012年。

[http://www.arthoop.com/news/201206/news\\_9d28de8ff9bb6a3fa41fddfdc28f3bc1.html](http://www.arthoop.com/news/201206/news_9d28de8ff9bb6a3fa41fddfdc28f3bc1.html)（閱覽日期：2013.4.24）

<sup>20</sup>胡惠林。〈文化民權：國家文化軟實力建構的戰略基礎和價值取向〉。《探索與爭鳴》，第10期。2010年。

<sup>21</sup>張殿軍，鄭興剛。〈對外文化交流：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3年。

<sup>22</sup>師英傑。〈論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構原則〉。《湖北大學學報》，38(1)。2011年。

還必須依靠文化軟實力的運作。建構中國文化軟實力應遵循五條原則：**堅持以一領多的原則**，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想，以駕馭當今文化層面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堅持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原則**，從而確保中國文化軟實力建構的獨特內涵，重塑中國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堅持文化創新原則**，這樣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與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備輻射力與感染力；**堅持會通整合的原則**，不僅要與外會通，積極發展，博采眾長，還要正視中國多民族、多習俗的現實，整合內部資源；**堅持人本原則**，這是中國文化軟實力建構的主體原則，即要以人為主體，進一步落實以人為本的戰略方針。

于炳貴、郝良華指出，<sup>23</sup>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制文化帝國主義、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已成為中國當前迫切解決的重大課題。作為構築國家文化安全的一種根本性戰略選擇，國家文化創新能力系統建設，是一個全民族的國家文化建設工程。因此，要從根本上全面實現對文化創新能力的提高，克服對西方文化的能力依賴，並加大國家對文化創新能力系統建設的政策投入，制定政府為實現國家文化創新能力系統建設，而必須面對全球文化競爭之文化政策和產業政策。只有這樣，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文化在全球化和文化帝國主義入侵的背景下才可以獲得獨立自主的全新發展，而且也只有這樣的發展中，才能獲得中國國家文化安全的全面保障。

綜而論之，文化安全的內涵應該可以概括為「本國文化精神型態不受別國不良文化影響與傷害，保持本國固有的繼承性和民族性」。<sup>24</sup>在保護本國文化主體性於不墜的同時，也保障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由心做起，民眾心之所嚮，政權的施政才得以風行草偃，國家機器的統治成本也能因此降到最低。對於全球化紛沓而來的問題，才能形成有效的文化壁壘。

至於國家文化安全管理機制，是一個國家按照本國的文化利益和國家戰略需求，建立起來的對國家文化安全狀態進行預警、應對和恢復的組織體系和制度形態。由於各國的文化背景及其在世界文化力量格局中所處的位置的差異，不同的執政主體獲取國家政權的方式和途徑的不同。因此，無論是國家文化安全管理機制的形成，還是作為一種國家文化制度的組織機構運作，國家文化安全管理機制

---

<sup>23</sup>于炳貴、郝良華。〈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哲學研究》，第 7 期。2002 年

<sup>24</sup>姜敏、馬瑞清。〈中國文化安全中的主要矛盾及應對策略〉。《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3（4）。2007 年，頁 135-136。

作的運作系統，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形態下都有著很大的區別。<sup>25</sup>

像是美國，既沒有文化部，也沒有文化立法，更沒有明確的文化政策，在維護文化安全上頭，卻是首屈一指。像是美國國土安全文化局（Homeland Security Cultural Bureau）的總幹事 Carolyn Parker Mayers 所言，<sup>26</sup>「國家安全不斷變化，令人難以置信地與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方面糾纏在一起。20 世紀，美國文化和價值觀一直是我們國家最大的財富，並向全球擴展。21 世紀，戰爭（包括我們正在進行的反恐戰爭）的得失成敗，將主要取決於人們心靈和頭腦——不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取決於我們能否贏得人們的心靈和頭腦。」

在此基礎上，美國國土安全文化局標榜其目的，在於使廣大公眾和領導人理解文化在促進和威脅國家安全中的作用，通過調整、引導文化生產的格局，達到保護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至於該局進行運作的手段，則是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和消除國家安全中存在的文化隱患；在國內外開展各種文化活動，培養、提升積極的美國文化形象；支持民間文化活動，為文化機構提供諮詢；通過研討會、出版物等形式，對文化機構領導人和管理者進行培訓。<sup>27</sup>

美國基於國家利益建構自身的文化安全運作機制，且明示其目的和手段。它不僅廣泛向領導人宣傳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出版以「文化安全」為主題的刊物，與好萊塢電影生產商、電影協會等組織密切聯繫，還組織以「文化安全」為主題的少年兒童夏令營，以使得文化安全觀念在美國政治、經濟、教育各領域深入人心。<sup>28</sup>

同樣地，中共目前的對外宣傳機制是如何轉型為文化安全體系，以符合其國家安全四大支柱的位階？相關組織體系是如何運作？外界對此節諱莫如深，對研究者而言，更是一項霧裡看花的挑戰。過去，中共對外宣傳機制的部署，既有線性組織的領導，也有非線性的協調或者是越級的任務編組。在中共機構改革後，類似文化安全機制的運作，是如何在平時與突發狀況體現出來？其理論與戰略在「歸口管理」後事權是否統一，勢將成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

<sup>25</sup>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sup>26</sup>Mayes, Carolyn P. *A Letter From Our Director General*. <http://www.hscb.org>. 2003.

<sup>27</sup>HSCB. <http://www.hscb.org>. 2003

<sup>28</sup>張玉國。《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 壹、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指的是研究者採取什麼樣的角度或價值取向，來解釋研究對象。在這裡，「理論」對研究者在解釋研究對象時，可扮演一種「指導者」或提供「有價值的關切點」的角色。所以，「理論」也是常被借用的理想研究途徑工具，只是不同「理論」的解釋角度、關切點之適切研究對象範圍各有不同。本文基於「戰略」及「文化」概念所衍生出的關切點，所採取的研究途徑，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歷史研究的途徑 (historical approach)：**把中共「國家安全戰略」、「文化安全戰略」的分析，看成是一種「歷史解釋」的過程。嘗試把被解釋事項 (explanation) 發生後的結果與歷史事實相結合，並建立被解釋事項與歷史事實之間具「延續性」(continuity) 的因果關係。

**第二、系統理論 (Systems Theory) 的途徑：**主要是採用 David Easton 「政治系統論」的觀點，<sup>29</sup>把中共政權親為是一個有生命、內部結構是有機的政治行為的「行為體」，來分析其中「國家安全戰略」和「文化安全」政策的制定、管理過程，解釋其轉變及進行預測。在這個研究典範上的分析工具使用，本研究藉用了美國學者 Daniel Kaufman 等人所提出的，原本是針對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分析架構的骨架，將之簡化、修正成適應、中共國家安全體系之機制狀況的新分析架構，即「中共文化安全政策分析架構」。其主要修正差別為：

- 一、戰略所追求的「價值」：由「自由、生存、財富」，修正為包括「主權維護、國際地位、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 二、將國家文化安全政策產生過程中之體系內部過程：由「國家利益」→「國家戰略」→「國家安全體系」→「國家安全政策」→「國防政策、外交政策、兵力結構、軍事戰略」，修正為「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戰略」→「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國家文化安全政策」→「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管理」。
- 三、上項「國家安全體系」主要因素原為「行為者」、「立法」、「組織」、「預算」，

<sup>29</sup>Daniel Kaufmann, Jeffrey S. Mckittrick and Thomas J. Leney (eds.), U.S. Nation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85), p.5. 轉引自翁明賢。(突圍：國家安全的新視野)。台北：時英出版社，2001年，頁44。

修正為「國家文化安全體系」主要因素為「中共中樞決策系統」、「文化安全政策決策制定者」及「職業文化安全專業家」三項。

**第三、非傳統安全的觀點：**以後冷戰時期之世界國家安全觀點之轉變，分析中共的「新安全觀」。

## 貳、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文獻分析法又稱為歷史文獻法，是一種系統化的客觀界定、評鑑與綜合證明的研究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真實性、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過去、洞悉現在、並預測未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獻分析在題材選擇與歷史研究法並無明顯差異，所差的不過是目的與陳述方式的不同。但是，文獻分析法若與歷史研究法並列，容易引人誤會為單純的文獻「沿革」介紹，或者只是歷史性的陳述與報導而已，使得文獻分析檢測能力變得彷彿文獻的價值是依附於歷史上。如此一來，喪失了意義與價值，尤其是文獻所突顯的啟示作用與參考功能文獻資料分析，所呈現歷史演變的因果關係與辯證。精確地說，此一研究法是一種因果推論的研究方法。文獻指的是過去歷史記載下的知識，涵蓋的範圍甚廣，由於文獻是否是真實的歷史記錄，對整體的研究價值產生重要影響，所以資料蒐整、分析、過濾、與檢驗，成為此一研究方法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文獻即使是真實的歷史記錄，能所呈現的只是真象的某一部份，而不是事件真實的全貌，筆者將契而不捨的發掘及還原歷史的真相。其次，文獻資料究竟是第一手，還是第二手以上的資料，有時亦會影響文獻分析時的效果，從事文獻研究時亦不應輕忽。

另外，除了這些考量因素之外，文獻分析法也有一些步驟需遵循。第一，研究者必須選擇及確定研究對象與範圍，再根據研究範圍與對象進行文章的假設擬定。假設的目的是提供研究者實證的基要命題，根據假設命題進行史料文獻的蒐整，藉此找到支持或反對的證據。第二，區分主要資料(primary sources)與次要資料(second sources)。主要資料通常是第一手資料，研究者藉接觸第一手資料，瞭解文獻史料的原委-頗為珍貴且有利於舉證事件始末。但是，研究者受時空環境與本身所能接觸資源條件所限，往往只能蒐集到第二手，或者只是前人已經完

成的考證資料。實際上，第一手資料固然珍貴，但並非所有第一手資料皆可充當有力證據，有時經過檢證或重新詮釋過的二手資料，可用程度甚至不亞於第一手資料。正如觀察法一般，文獻分析法雖是科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使用上仍有一些優點與缺點。

本文依循「文獻分析法」原則與理論，透過引用官方資料、檔案或正式學術論文作為研究資料來源與分析基礎，並針對資料做有系統地整理及分析。文獻來源主要為中國大陸政府官方資料，包括領導人在公開場合的談話以及相關報導，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的報導資料，中國大陸統計局之統計數據；另外還有中國大陸及台灣學者對文化安全所撰寫的學術論文、期刊和專書等。

經分析歸納整理前述相關文件，本文將以中國大陸當前國家安全戰略背景為出發點，探討中國大陸對文化安全之警醒，及中國大陸對文化安全戰略之擘畫與執行，並分析文化安全政策對中國大陸之影響。

####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文獻資料蒐集與分析。目前國內關注中共「文化安全」議題者並不多見。舉其要者，僅陳筑君（2006）所撰寫的《中國的文化安全問題之研究》等文，對於深入瞭解助益有限。在中國大陸方面，則是從國家戰略的架構思考此節。目前，除相關專論約 356 篇，已經初步針對文化安全的相關議題進行探討，惟囿於中共對外宣傳及文化安全等實際運作，多屬於中共政權內部難以言宣的秘密，相關資料取得十分困難，且礙於本文篇幅無法全數兼顧，因此在研究精準上可能會有其疏漏不足之處。

至於研究架構第一章為緒論，本章將依序介紹本文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理論與研究可能碰到的障礙及研究方法，還有回顧學者相關議題的研究和論點，以驗證作者的途徑是否正確。

第二章為中共文化安全的理論基礎，本章介紹中共新的國家安全觀是綜合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在

內的國家安全觀。<sup>30</sup>而其中的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一個新的課題，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是影響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中共政權而言，其在面對全球化，資訊化所帶動的內外環境變化時，文化安全就越來越自然地成為其國家安全的關鍵因素。

由於中共政權的權力來源與屬性，特別係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差異性，使得在面臨全球化的衝擊下。所引發的國家安全自我憂慮，著眼在文化因素所起的「和平演變」。因此，文化安全乃成為中共整體國家安全戰略核心。且其重要性正日益顯著。

第三章為中共文化安全政策的機制與管理，針對中共對其國家實力的構築，不是建立在空泛的理論或構想，而是認為在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應有不同的重點要求，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是中共發展國家實力建設的主訴求，對於軟實力有所忽視，惟在經濟發展已達一定程度，中共則對其軟實力之發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對文化軟實力的加強，更為當前戰略執行重點。

第四章為中共文化安全的戰略架構，在中共的戰略思維中，文化安全戰略，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整體，所進行的國家「文化管理意志」和「文化利益」的統一。認為他是由特定的政治實體和代表特定的政治實體利益的人，對社會文化行為所進行國家規範、促進、導引系統，因此，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的管理架構，是指以一定的社會文化現象，根據一定時期的國家「文化利益」，制定文化政策並加以確實執行，以實現國家文化目標的行為者及其組織架構，所形成的體系。<sup>31</sup>

第五章結論，則依研究觀察提出中國在文化安全所作之努力與不足之處，並將在既有基礎上，繼續蒐集相關資料，包括蒐集有關的中共對外宣傳與文化安全相構連的資料，以及更廣泛的學術文獻檢閱，並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以為後來探究。

---

<sup>30</sup>李春霞。〈我國國家文化安全面臨的威脅和保障措施〉。《南陽師範學院學報》，（4）。2007年，頁 12-13。

<sup>31</sup>梁守德主編。《新形勢與新國際觀》。北京：中央編譯，2004年。

## 第貳章 中共文化安全的理論基礎

當前中共新的國家安全觀，是綜合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在內的國家安全觀。<sup>32</sup>而其中的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一個新的課題，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是影響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中共政權而言，其在面對全球化、資訊化所帶動的內外環境變化時，文化安全就越來越自然地成為其國家安全的關鍵因素。儘管如此，文化安全卻往往最容易被忽略，因為：文化因素的影響是深層的、潛移默化的，且不會導致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的直接後果。

由於中共政權的權力來源與屬性，相對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而言的差異性，使得它在面臨全球化的衝擊下，所引發的國家安全自我憂慮，主要並非落在政治或軍事因素，而是在於文化因素所起的「和平演變」。因此，文化安全於今乃成為中共整體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此一特殊現象的重要性，正日益顯著。

從總體的、一般性的概念來說，文化安全就是以國家和社會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的安全。<sup>33</sup>本章以下，將針對中共文化安全相關的理論環節進行探討。

### 第一節 中共的國家安全取向

在中共學界，對於「國家利益」的界定各有不同，有的認為「國家利益是民族國家追求的主要好處、權利或受益點，反映這個國家全體國民及各種利益集團

---

<sup>32</sup>李春霞。〈我國國家文化安全面臨的威脅和保障措施〉。《南陽師範學院學報》，（4）。2007年，頁 12-13。

<sup>33</sup>樂後聖。《國家和平發展戰略》。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

的需要與興趣。」<sup>34</sup>有的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切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和精神需要的東西；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sup>35</sup>有的認為國家利益的定義是「國家需求認定的各種客觀對象的總和。」<sup>36</sup>還有的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維護和創造本國大多數居民生存和發展所需的諸因素的綜合，是主權國家在國際環境中生存與發展需要的綜合體。」

37

大陸學者子杉認為：「國家安全就是指一個國家處於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是維持主權國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種要素的總和，也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sup>38</sup>顯然，這裡所指的「國家根本利益」，不僅僅指國家政權的存在和領土完整，而且還包括國家的經濟利益、貿易條件保障、關鍵性資源的獲取途徑、主導意識形態的安全等其他方面。與此概念相連結地，亦有部分大陸學者將一般的國家安全事務（或稱國家安全的關注焦點），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是指國家的安寧和穩定；對外則是指國家免受外來的侵略、干涉和控制。事實上這種提法與前項（子杉）之定義是相連結的。

綜合上述各種主要提法，就中共國家安全的取向而言，彼等之立論基礎統一於以下命題的：

**對於一個國家的安全來說，最根本的事務就是要確保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確保國家獨立自主的主權地位，而且，這些事務才是國家安全的最高價值所在。**

據此，後者再對國家安全的實踐（完善）面向加以分類，認為：國家安全可

<sup>34</sup>王逸舟。〈國家利益再思考〉。《中國社會科學》，(2)。2002年。

<http://qkzz.net/magazine/1002-4921/2002/02/1604529.htm>（閱覽日期：2009.3.5）

<sup>35</sup>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sup>36</sup>洪兵。《國家利益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

<sup>37</sup>朱炳元編。《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sup>38</sup>子杉。《國家的選擇與安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以分為以下四個方面：<sup>39</sup>

- 一、民族和國家的生存不受威脅，這是國家安全的基本要素；
- 二、國家領土的完整不受侵犯；
- 三、國家的政治獨立和主權完整，即維持和發展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並保證其不受外國干涉和控制；
- 四、國家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

準此以降，由中共所領導的大陸學界乃至政府，基本上是口徑一致地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主權國家在總的國際關係中生存與發展需求的總和，它是國家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鄧小平曾經指出，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鬥爭中，不論哪一國「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他認為在國際鬥爭中，是非是涉及中國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關係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能不能達到本世紀和下世紀目標的利害，任何國家都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中國利益的苦果。<sup>40</sup>有鑒於此，中共將國家利益視為一個主權國家、國民利益的最高體現，被確定為中國此時對內、對外政策的最高準則。而國家主權對中共而言，則更是做為一個民族國家對內高於一切和對外獨立的權力，無疑地更是國家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共所認為的，一個國家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鄧小平即曾說：「除了人權、人格之外，還有國權和國格，而後者要比前者更重要」。<sup>41</sup>

簡言之，在由中共所領導的現代中國大陸，鄧小平已確切地將維護國家利益定位為國家安全利益的最高準則，同時也將之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而維護主權，則更是被其認定是國家利益之前提。其後繼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亦服膺此節，迄今未曾稍有動搖。

---

<sup>39</sup>張建華編。《中國面臨的緊要問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8年，頁143。

<sup>40</sup>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57。

<sup>41</sup>朱炳元編。《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30。

## 第二節 中共文化安全之內涵與特徵

### 壹、「文化安全」在當前中共國家安全戰略中之角色

由於中共政權一向擁有對整個中國大陸社會之資源，進行權威性價值分配的權力，其價值選擇，對於中國大陸某些政治、社會或經濟結構的變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這裡的中共「文化安全」，事實上是中共通過其對中國大陸社會的統治行為，來體現其在國家文化發展上的意志，並實現其對中國大陸之政治發展、社會發展，甚至是經濟發展的國家安全戰略管理。在概念上，並非是聽任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其被客觀環境所制約的「文化」狀態。亦即，中共所希望中國大陸「文化」的發展趨勢、並非是中國大陸客觀環境、客觀歷史條件的反映，而是中共意識形態導引的結果。

「文化安全」之戰略功能，著重在軟性、無形的，但也是全面性、長久性的，對於當今中共所正面臨的「社會不穩定期」而言，具有相當高的時代適合性。這與「文化安全」的「軟實力」本質直接相關。

文化的「軟實力」性質，主要是相對於硬實力而言的。因為，文化具有引導、激勵、凝聚等功能，對社會大眾可以起著「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但同時，發展文化軟實力，也是不能依靠強制力或者行政命令，那樣就違背了文化軟實力的內在發展規律。這種文化安全的特殊性，正好可補充中共當前的戰略缺口和弱點。

中共於 2006 年 10 月的中共第 16 屆 6 中全會中，通過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明確將「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與「資訊安全」，列為當前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管理的四大支柱。事實上，中共此一「四大安全」的提法和概念，是深具時代針對性的。在前揭戰略環境變化中，中共以經濟戰略為核心的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到了 21 世紀，

已經明顯引致某些中共國家安全戰略上的弱點與缺口。這些戰略缺口與弱點，集中反映在該《決議》中所同時揭示的當今中共社會內部的矛盾狀況，即社會的「不和諧」現象。

若從政治學或社會學的相關發展理論的角度做思考，或從制約「不和諧社會」政策的內在邏輯做思考，都會發現：若要根本性的改善當今中共社會「不穩定」、「不和諧」之社會矛盾狀況，其有效的途徑，亟需涉及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尤其是進一步開放、擴大人民直接政治參與的權利。但是，這現階段中共做不到，也不願意做。既是如此，為補國家安全之戰略弱點與缺口，中共乃轉而以另謀建立保護其新「政治利益」與新「社會利益」為特色的新國家安全戰略管理架構，做為實際應對此波社會矛盾狀況的對策。

《決議》中所提出的大陸社會當前諸多「不和諧」問題，表面上是分別屬於經濟、社會發展之政策，分別隸屬於行政管理範疇的內部建設事項。但實際上，中共在不推動「政治改革開放」的戰略前提下，對之是以精神力量導引面向的「意識形態鬥爭」之戰略高度做概括的，並以「文化安全」的戰略概念和運作機制，做為對應此項新國家安全戰略挑戰的主軸。它的實質內涵重點是：對外反制導引中國大陸社會、政治不穩定的「和平演變」因素；對內則重新向人民「畫大餅」——更系統化地規劃出「現代化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社會」之理論、圖像與願景，爭取政治認同。

文化的定義若從結構上劃分，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個層面<sup>42</sup>，而中共「文化安全」的「文化」，是從其價值系統意義上做定義的文化。中共將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做概括。它的戰略角色，除了上述的適應並保護中共的新「政治利益」與「社會利益」之外，另外還有一個重要戰略功能必須一提——它也是當今世界潮流所推動下的一種重要的經濟戰略型態。

中共「文化安全」的機制運作，也包含經濟面向的政策；它主要表現在提

---

<sup>42</sup>李金齊。(文化安全釋義)。《思想戰線》，33 (3)。2007年。

高中共的「文化產業」之競爭能力之上。這個戰場，涵蓋兩大領域：它既是精神層面的中外文明程度高低的競爭，即征服世界人心的競爭，也是經濟層面的產業能力、市場的競爭。後者對於中共及世界各國而言，在經濟上創造的產值越來越可觀，占各國 GDP 的比重也越來越高。也就是說：「文化安全」的性質，於今是中共發展「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是中共能否克服經濟發展的瓶頸、獲取進一步經濟成就的關鍵。在戰略規劃上，它是中共增長軟、硬實力的有機結合表現，也是中共當今在對抗美國等強大「帝國文化主義者」文化勢力的支撐槓桿。

## 貳、中共文化安全之內涵與特徵

中共對其「文化安全」的內涵，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健康發展來做概括。

此一「文化安全」的精神層面目的，若從文化建設的實踐角度來看，是要使中國大陸的文化變遷，由中共「正確的」價值觀念導引，即由中共所揭櫫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導引，使中共本身的價值體系，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並保持穩定性。從社會功能的面向來說，中共的「文化安全」，是要對社會整體之協調發展，發揮「調適」的作用。從全球化的背景來看，中共的「文化安全」是要保持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及文化選擇與發展的自主性；即對中國的「文化主權」進行維護。

綜合上述可知：從精神意義上來說，中共「文化安全」的戰略立意，是一種長途而宏觀的設計，是要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整體發展，做出具有框架性規範作用的深遠建設。而這個戰略的實施過程，本身也是中共的一個根本性核心價值的實踐過程。

在外觀上，即中共「文化安全」在政策面向上的表現，是要使中共之軟、硬實力兼備。在增強軟實力方面，中共著重強調、鞏固或拯救當前中國大陸人民的

「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之所以繼續存在的重要因素，也是個人或國家判斷其一切「文化利益」的基礎。在建立「文化認同」的導引和宣傳政策上，中共的做法和我中華民國政府當今的政治立場，自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中落差最大的地方，在於中共所宣稱而中華民國政府卻從來都堅決反對的中共「政治意識形態」說法：中共定義「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並強調以此特點是做為當代「中國人」的重要辨識標誌之一。這在歷史意義上，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命題。但對中共的「文化利益」而言，卻十分明顯，因它是使中國人民認同中共實施「階級性國體」的合理性來源。

其次，中共也提出一些能使「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重新相連結的價值理念，並將之寫入中共黨的文件內，形成其重要的文化政策，成為其宣傳上的重點，並希望能將之引導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例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胡錦濤的「以人為本」思想等。事實上，這樣的文化安全政策作為，也被中共定義為：是一種「實踐型的」中共意識形態。

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相適應的結果。其原由是：中共主觀上（實際上是基於文化戰略的需求）將其當代的「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定義成為以下具有三層結構關係的意識形態：最上層意識形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思想和「三個代表」思想構成；中層是以「民族精神」主流價值體系構成；下層是以公民、規範性的道德構成。中共設想：通過這三層文化價值子系統的建構和相互聯繫，可使中共在社會之主流價值觀的塑造問題上，順利將中共的「文化利益」與「政治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

再其次，中共的「文化安全」政策內涵，也表現在經濟戰略的領域。中共希望以發展「文化產業」，做為中國一個新的經濟建設的立足點，並藉此取得與世界各「文化大國」，共同競爭越來越龐大的世界文化市場的利益。在這個政策思考向度上，中共也正大力倡導「提高中國的文化創力」。因為，它是提高中共之

文化市場競爭能力的內在、無形資本。當今，中共對「提高中國的文化創力」之投資與建設規劃的必要性，已有深刻體會。

### 第三節 中共的文化安全戰略概念

#### 壹、中共的文化安全戰略部署

談到文化安全的戰略部署，應該先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資源談起。所謂執政資源，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掌國家政權所依靠的客觀的、主觀的、物質的、文化的、體制的、概念的、歷史的、現實的資源。」<sup>43</sup>事實上，世界任何一個政黨執政，都需要擁有其思想與文化上的資源，以引導群眾的認同，從理念上鞏固執政基礎。簡言之，這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文化安全」上多所著墨的用心，其意旨，無非在爭取自其「專政」的合法性的認同。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期，社會矛盾的發展越來越複雜。矛盾之主體日益多元化，涉及各行各業、各種生活面向，並且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呈現矛盾相互交錯的現象。而矛盾表現的形式，也日趨激烈，尤其是在民族、宗教、人權等問題上，已經被中共當局視為「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滲透、顛覆和製造社會動亂的藉口」。中共能否处理好這些矛盾，關係到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成敗，關係到中共「專政」地位的穩固，也是對中共統治能力的重大考驗。基於對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之體認，中共於 2004 年第 16 屆 4 中全會中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首度將「文化安全」確定列為國家四大安全之一。該《決定》中指出：

**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安全，針對傳統安全威脅**

---

<sup>43</sup>劉先春。《中國共產黨執政資源研究》。北京：高等教育，2008 年，頁 124-125。

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關係相互交織的新情況，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完善國家安全戰略，抓緊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科學、協調、高效的工作機制。堅決防範和打擊各種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有效防範和應對來自國際經濟領域的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顯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共當局除意識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外，並將文化安全列為國家的重大問題來安排和部署，以便確保中共能明確取得對中國大陸社會的控制權。<sup>44</sup>而中共迄今已意識到的，有關其文化安全環境的「威脅」因素，則更是中共首要針對的敏感戰略對象。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即曾針對當前對大陸文化安全構成威脅的具體專項，列出以下的「文化安全的五大隱憂」，包括：<sup>45</sup>

- 一、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文化滲透愈演愈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有計畫的進行滲透、分化，公開性與隱蔽性手段交錯，以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多手法的進行滲透。
- 二、網際網路成為西方文化滲透的主要工具及載體，西方發達國家憑藉佔據著信息傳播的制高點，利用即時聊天工具、電子郵件、網路論壇、線上廣播、線上電視、電影以及電子商務等散佈各種詆毀、顛覆中國政權的信息，傳播煽動性、破壞性言論和政治謠言，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民眾的文化思維和價值判斷；
- 三、青年人、「三失群體」是西方文化滲透的主要對象。<sup>46</sup>西方國家針對「三失群體」急於尋求安慰及解脫的困境，利用傳媒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經濟發展、和人權狀況等大肆抨擊。並憑藉已宣揚多年的「自由民主」意

<sup>44</sup>王佐書。《中國文化戰略與安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22。

<sup>45</sup>長子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隱憂〉。《中共山西省省委黨校學報》，31(1)。2008年，頁82-84。

<sup>46</sup>所謂「三失群體」指的是中共的圍有企業改制、重組、破產等所引發的職工下崗失業、農村土地徵用所造成的農民失地、城市房屋拆遷所形成的居民失房的三大弱勢群體。

識，對青年人、「三失群體」等民眾進行反政府煽動，並給以廣泛的同情和輿論支持，對他們進行滲透。

四、地下非法文化組織活動蔓延，盜版、盜錄層出不窮；

五、影響社會穩定的「不良思潮」諸如迷信、邪教與黃、賭、毒之類的不良文化蔓延。

除了以上具體、首要的文化安全「威脅」專項之外，構成影響中共文化安全的因素，尚有很多是潛在、間接和無形的因素，並無法全面列舉。所以，欲妥善維護文化安全，事實上需要以較高的戰略層次，以及綜合性的全般思考，才能得以做到。故在借鑒外國的經驗後，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等有關中共文化安全戰略部署的專家、學者，曾針對當前中國大陸文化安全之維護，提出以下兩大政策方向：<sup>47</sup>

## 一、增強綜合國力

認知到：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後盾。一個國家的文化型態，是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在經濟地位的強勢必然造成其在文化領域的強勢地位；經濟和科技實力的強大，為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領域的滲透上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的前提，是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了，就能在世界競爭中處於優勢的競爭地位，國家的文化安全也才能夠有所保障。

## 二、構築文化屏障

認為文化需要交流和合作，但在交流與合作中，一定要有健全、完善、有效

---

<sup>47</sup>長子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隱憂〉。《中共山西省省委黨校學報》，31（1）。2008年，頁82-84；李天明、周暉、楊中華、關玉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國文化安全策略研究〉。《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6）。2007年，頁1-6。

的文化安全防禦體系，包括預警機制、干預手段和進入限制等。其具體措施，包括下列：

(一) **建立文化安全的警戒線**：在全球化背景下，要通過對「文化商品」的流動趨勢及市場狀況，針對其可能導致對中國大陸文化事業的威脅和不良後果進行分析，及時準確地發出預告和警告，並迅速做出反應。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管理手段，把可能危及中共文化安全的因素和力量，控制在警戒線以下。

(二) **加強資訊內容的安全管理**：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堅決制止毒害人民、污染社會和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在境內網路中傳播，並要對外來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提出明確的准入條件要求。

(三) **建立資訊安全監控體系**：完善和加強中國大陸之「信息安全監控系統」包括加強資訊內容安全管理、查處違法、防範網路犯罪攻擊、病毒入侵、網路洩密等之技術提供與支持；並建立相應的「網路輿情應急處置機制」，防範網路輿情失控，避免社會動盪。

(四) **培育好出版物市場**：在出版物市場對編輯出版的各環節影響日益加大的情況下，並刻意著重培育新聞出版業，使其在出版物市場繼續居於主體和主導地位。此節之實踐結果，將直接影響中國大陸意識型態的趨向與中共國家安全。

## 貳、中共國家安全的戰略核心在「文化安全」

21 世紀的頭 20 年，被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難得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對於這個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和態度，中共在其第 16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解釋的十分清楚，也就是扣緊「中國和平崛起的時代背景」，做為日後戰略發展的重要部署。對此，江澤民曾說：「綜觀全局，21 世紀頭 20 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sup>48</sup>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十五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

<sup>48</sup>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9。

展歷史考察」的問題，進行「集體學習」，以探討大國興衰的歷史規律。胡錦濤在該次「學習」之後所發表的講話中說：「歷史一再表明，機遇極為寶貴，稍縱即逝。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把握住了機遇，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成為時代發展的弄潮兒；而喪失了機遇，原本強盛的國家和民族也會不進則退，成為時代發展的落伍者。」<sup>49</sup>

綜觀近期中共之歷史發展，整體而言，中共第 11 屆 3 中全會後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帶來中國大陸經濟體制的改革；而在冷戰結束後，中共更逐漸體認到全球安全威脅來源已發生變化，全球市場資源配置結構也出現重大變化，進而認定「以意識型態為主的國際主義」，已漸成為西方強國對應中共「和平崛起」之基本格局特徵。從而「文化安全」乃被中共認定是其現階段「國家戰略的根本利益」。

<sup>50</sup>

此外，在自身的文化發展上，由於「全球化」現象使得中國大陸原本存在的，會對大陸之文化發展產生制約作用的體制性障礙和政策性壁壘一一破除，目前中國大陸接受「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發展，面臨到的主要瓶頸，已經不再是資本和世界市場資源不足的問題，而是人才問題。針對此問題，胡惠林曾指出：「文化人才構成和文化人力資源的質量，正在日益成為阻礙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文化因素。」中共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確切地認識到：在現今的國際社會格局中，文化人力資源是其國家文化競爭力的核心；所有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的競爭與較量，最終都將表現為人才的競爭與較量，也就是表現為爭奪高品質的文化人才的競爭與較量；所有的文化戰略目標的實踐，離開了「人」都只能是一句空話。

故對中共而言，能否最大限度地挖掘和發揮中國人力資源的優勢，把豐富的人力資源轉換成中國大陸的文化創造優勢，是對其「國家文化制度建設」的檢驗，同時也是對中國文化凝聚力和吸引力的證明。因此，在文化、意識形態和心

<sup>49</sup>學習簡報。〈尋找中國崛起的脊梁〉，第 12 期。2006 年。

<http://www.acem.sjtu.edu.cn/upload/publish/img/1070301451480.pdf>（閱覽日期：2013.3.8）

<sup>50</sup>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27-154。

理領域裡，不斷強化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滲透力，也是現階段中共國家安全的戰略的核心事項之一。

## 第四節 國家安全與文化安全

在當代國家的安全體系中，文化安全是一個重要的次級體系；而且，文化安全所影響的，是國家安全的深層次問題。由於文化多元化與「全球化」現象相伴而生，並以越來越便捷的信息傳播技術為通路和媒介，在全球範圍內不斷促進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但是，這也同時引發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衝突；乃至引發文化上，尤其是文化發展自主權上的相互鬥爭。故而，於今觀之，文化安全乃是國家安全的最高層次問題，它涉及國家發展的方向與價值的整體。也可以說：文化安全是國家穩定與發展的精神層面前提，更是國家安全中最高層次的安全。

### 壹、文化安全與軟實力

當代的全球化現象，正在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中國人思考問題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正影響著人類歷史改變的進程。<sup>51</sup>而把全球化常作是討論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也已逐漸成為中國社會菁英的共識。

全球化作為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改變世界的經濟結構，也深刻地影響世界上的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在全球化時代裡，一個國家的力量不再侷限於單項的國家實力，「文化」成為人類社會財富創造的嶄新型態，同時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之一。而「文化國力」作為軟實力已經成為國際力量平衡的重要因素。其主要原因是：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特徵是「和平競爭」，因此，國家之間的權力（影響力）關係，「文教力」等文化上的「軟權力」，即成為評斷

---

<sup>51</sup>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00-106。

相對綜合國力評比的重要基礎因素。<sup>52</sup>

美國學者奈伊 (Joseph S. Nye)，是首位提出將國家實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大類觀點的當代學者。其所稱的「硬實力」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科技力量等；至於「軟實力」則是具有彈性的實力，包括國家凝聚力、文化普遍被接受的程度等。<sup>53</sup>奈伊之軟實力觀點，於當代學界引起頗大回響，從而使「文化國力」成為評估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

文化並不是虛無的單純精神力量，它滲透於經濟組織和社會結構中，發揮著動員、協調、調動、組織國力，或者發揮著蠱惑人心、渙散國力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其國家的政治合法性有比較一致的認同感時，該國家政治體系就處於比較良性的運作狀態；反之，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對該國之政治合法性持懷疑的態度，國內的政治環境就會惡化並產生社會動蕩，進而危及國家安全。<sup>54</sup>故「文化安全」必然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也可以說是國家安全的精神面向前提。

目前，中共學界對於「文化安全」的概念、界定，尚未達成共識，但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層面的界說：<sup>55</sup>

## 一、主權論

胡惠林以系統整體的觀念對文化安全進行了界定，指出：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的「文化主權」神聖不可侵犯。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發展選擇必須得到尊重，包括國家的文化立法權、文化管理權、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選擇權、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獨立自主權等不可侵犯；而文化安全，就是指一國文化之生存，免於威脅或危險的狀態。<sup>56</sup>

<sup>52</sup>宋國誠。《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一公元 1990-2020》。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頁 6。

<sup>53</sup>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2002, p176.

<sup>54</sup>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6)。2007 年，頁 53。

<sup>55</sup>解學芳。〈一個全心的學術研究領域：國家文化安全〉。《高校社科動態》，(2)。2007 年，頁 16。

<sup>56</sup>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06-107。

## 二、價值論

林宏宇認為文化安全是指本國文化的精神形態，不受別國不良文化形態的影響與傷害，保持本國文化固有的繼承性與民族性。<sup>57</sup>欣榮則認為文化安全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主流文化價值體系，免於遭受來自內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蝕、破壞或顛覆，以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價值系統的狀態。<sup>58</sup>

## 三、功能論

林寧側重文化的綜合功能，指出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能夠獨立自主地選擇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抵制其他國家試圖以包裹特定敵對意識形態的政治、經濟、民主模式強加予本國的做法，防範其他國家對本國人民之文化生活進行滲透，保護本國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制度，保持文化的民族性，維護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並通過國家文化交流，擴大本國文化的影響力。<sup>59</sup>

綜而論之，當代中國大陸學界對「文化安全」概念的相關具代表性學說，應該可用以下一個基本立場作「統一」上的概括：「本國文化精神型態，不受別國不良文化影響與傷害，保持本國固有的繼承性和民族性。」<sup>60</sup>事實上，此一基本立場在保護中國之文化主體性於不墜的同時，也保障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由心做起，成為民眾心之所嚮，政權的施政才符以風行草偃，國家機器的統治成本也才能降到最低。而且，這對中共政權而言，在對應「全球化」背景下雜沓而至的國家安全問題時，也能形成有效的文化壁壘。

## 貳、文化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作用

首先，文化安全有助於一個民族國家本身，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並由此提高國家的整體安全程度。文化是維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團結穩

<sup>57</sup>林宏宇。〈文化安全：國家安全的深層主題〉，《國家安全通訊》，(3)。1999年，頁12-13。

<sup>58</sup>欣榮。〈建立文化安全體系捍衛我國的文化安全〉，《國家安全通訊》，(3)。2002年，頁16-18。

<sup>59</sup>林寧。〈關注文化安全加強先進文化建設的思考〉，《理論月刊》，(6)。2004年。

<http://scholar.ilib.cn/A-QCode~aq200502003.html> (閱覽日期：2013.3.5)

<sup>60</sup>姜敏、馬瑞清。〈中國文化安全中的主要矛盾及應對策略〉，《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3(4)。2007年，頁135-136。

定的精神紐帶，所以，它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安全可使全體社會成員在國家安全觀念、目標、行為準則等方面保持一致，並形成心理認同的整體力量，表現出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sup>61</sup>可見，文化對增強民族凝聚力和綜合國力、提高國家安全程度均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文化安全有利於保障社會秩序的形成和有效運轉。文化不但能激勵人的思想和行動，而且能通過它微妙的暗示與滲透，使社會成員形成價值共識和安全目標認同，並能實現自我控制，形成有形、無形、強制、非強制的規範作用。

**第三**，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有助於保存人類文化多樣性。人類社會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形成多種多樣文化，千姿百態、各具特色、各有所長，此即世界的文化多樣性。而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精神的創造性表現，為多元的文化共存提供良好條件，也是人類的寶貴資產。然而，文化的「多元共存」並不是文化多樣性的自然結果，而是各種不同文化主體自主選擇的結果。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有的文化曾遭受過種種人為的限制和不公的待遇，使得其無法自由、自然地發展和保存，有的甚至已經從人類文化中消失了。因此，要使不同文化多元共存，就必須保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使弱勢文化得以繼續生存。

在這個立場上，中共近年來已感受到其文化自主發展的危機。中共在「文化安全」上所一再堅持的「文化主權」觀點，泰半也是針對此一憂慮感而發的。中共認知到：對世界而言，國家的「文化主權」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屏障，亦即，維護各國家文化安全，於今對全球而言，能防止文化多樣性的迅速消失；多數民族國家而言，保障一國「文化主權」的充分行使，是在全球化的客觀環境下，一個有效防止各種強勢文化滲透、破壞該國社會結構穩定的有效途徑。

**第四**，對一國的外部環境而言，文化安全可使文化通過正常的國際交流，為一民族國家爭取良好的國際安全環境。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席捲，文化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它不僅是冷戰後各

---

<sup>61</sup>嚴興文。〈試論國家文化安全的內涵、特點和作用〉。《韶關學院學報》，28(2)。2007年，頁138-141。

民族國家保衛其國家主權的重要形式，也是冷戰後構建國際合作關係的重要橋樑--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在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也能有效發揮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並且往往也能透過彼此相同或相近文化特質所形成的文化認同感，建構出強化國際合作的紐帶或橋樑。



## 第參章 中共文化安全政策的機制與管理

在中共的戰略思維裡，文化安全戰略，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整體，所進行的國家「文化管理意志」和「文化利益」的統一（或曰二者的「集中反映」）。認為它是由特定的政治實體和代表特定的政治實體利益的人，對社會文化行為所進行的國家規範、促進、導引系統。因此，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的管理架構，是指以一定的社會文化為對象，根據一定時期的國家「文化利益」制定文化政策並加以確實執行，以實現其國家文化目標的行為者及其組織機構，所形成的「體系」。<sup>62</sup>以下，將針對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管理架構中的「機構」、「政策」與「體系的機制設定」（或曰戰略管理的目標）等議題，詳加說明。

### 第一節 中共文化安全的政策

依照本文「緒論」中，對於文化安全性質的說明，可推證這裡的「文化安全」也同樣是一個「戰略」性質的研究議題，也就是一種有價值取向、有目的性的研究議題。其研究成果，是針對政策參考之用，以便該政策能對研究客體（通常是「國家」）創造利益。所以，這裡的「文化安全」離不開國家利益，必須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和定義文化安全。如果不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文化安全問題的提出就沒有太多意義。

在弄清楚中共對於「國家利益」的界定與追求重點後，主要說法還是必須再釐清就中共政權而言，國家利益裡的「文化利益」何在？才能適切地提出符合中共國家利益的文化安全政策。此乃「戰略」思考程序上的內在定律。本處以下，將針對建構中共政權文化安全的四大基本文化利益，進行說明，俾瞭解中共在制定其文化安全政策上的國家利益準據所在。

#### 壹、建立中國的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另有人譯作文化身分，也有人譯為文化特徵。

<sup>62</sup>梁守德主編。《新形勢與新國際觀》。北京：中央編譯，2004年。

在《美國傳統辭典》中，identity 一詞的意思，主要是認同、特徵，即 The collective aspect of the set of characteristics by which a thing is definitive recognizable or known. (從本質上確認或識別某物的一系列特徵的總和)。文化認同揭示出文化與人的關係。文化的本質特徵之一，是讓一個人、一個群體或一個民族和國家擁有身分感和歸屬感，這是「文化安全」這個概念的重要性的主要所在。故欲研究一個國家的文化利益、維護其文化安全，必須以該國之民族文化認同作為基本的出發點，才能逐步建構出文化安全政策。<sup>63</sup>文化認同是吾人思考文化利益的基礎，也是文化安全政策重要的組成部分。既然如此，那麼對中共而言，「中國」這個實體到底是什麼？屬於中國的文化認同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認知學上有一個原理：人們總是通過與他人的區別來定義自己，即通過分清「我不是什麼」而回答「我是什麼」。依此類推，中國的文化認同應該就是：做為中國人、做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與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人相區別的那些文化特點。以此認知出發，無論是從個體的文化認同，或是從集體文化認同來說，如果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特點都不存在了，那麼其國家的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就已經不存在。在這一點上，個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找到了結合點。這是一切文化利益的基礎。<sup>64</sup>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民族文化認同是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全部意義之所在，是做為「中國人」之安身立命所在。

從以上區別定義的方法做推論，大陸學者張玉國再將當前中國之文化認同的淵源，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sup>65</sup>

### (一) 自然地理條件

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幹，向外擴散至整個中國版圖。這一版圖從秦始皇統一天下，到當代中國，變化不是很大。

### (二) 民族狀況

以華夏族（後來的漢族）為主幹擴充至整個中華民族。依中共官方之統計定義，中華民族到現在共有 56 個民族。<sup>66</sup>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以凝聚力極

<sup>63</sup>張玉國。《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當代文化產業論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14-115。

<sup>64</sup>張玉國。《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當代文化產業論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15。

<sup>65</sup>張玉國。《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當代文化產業論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20。

<sup>66</sup>中共政權成立後，通過識別並經中央政府確認的民族共有 56 個。由於漢族以外的 55 個民族相對漢族人口較少，習慣上被稱為「少數民族」。http://www.lvyou14.com/minzu/index.html (閱

強而統一、凝聚成的大民族。

### （三）文化表現

以中國語言文字為代表，成為綿延至今的五千年歷史文化，包括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學藝術、學術思想、價值觀念和制度安排，乃至全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創造。

### （四）政治意識型態

為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理想道德。這也是當代中國在別其他國家人民的一個不可抹殺的特點。

從上述張玉國主張之當前中國文化認同淵源中的第四點，可知他是站在中共政權之立場做歸納的，並且認為中國大陸目前存在的階級性國體，是可以做為當代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之代表性特徵。但是，這個觀點若與長久以來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相比較，或與當今在臺灣地區生存發展的中華民國之國體內涵相比較，都是相去甚遠的。所以說，張玉國此處特意指出的「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理想道德」的政治意識型態，客觀上並不能做為中國文化在區別定義上的認同淵源。然而，這一點卻是「中共政權」在區別定義上的文化認同的相當明顯特徵——它正是中共政權「文化利益」之核心來源。就站在探討中共政權之間家利益、文化安全戰略及其戰略管理利益的立場而言，特意強調這一點，反而才是中共國家安全戰略上的重點。至於其他三點，則與中國傳統文化或中華民國的立場無異，都是中國之文化認同的重要淵源。

## 貳、建立中國的主流價值

在中國的文化認同中，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體系特別重要。因為儒家思想所構成的價值體系，和其在現實上所構成的社會規範，是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人倫思想，和當今中國社會尚存在的人倫關係即是。

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認同儒家思想這一點，當今中共政權雖未盡然全部接納，但在追求其戰略上的國家利益時，也不予完全否認；甚至目前在宣傳上

還刻意加以強調，以便與西方文明區別，增加其政權本身抗拒西方「和平演變」的內在能力。例如，大陸學者周曉陽、張多來，為宣傳、闡釋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曾為文論道：「江澤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向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在總結新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三個代表』為核心的思想、理論體系，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sup>67</sup>。又例如，學者李向國，在為文宣傳當今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的「以人為本」思想時，也強調：該「思想」是「繼承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sup>68</sup>而中共在宣傳其當前領導人胡錦濤所推展的「和平外交」作為，所常常對外宣揚的「和合思想」時，也宣稱：「幾千年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和合思想』，如今在中國的外交事務中大放異彩。」<sup>69</sup>可見中共當今對內、對外所欲推展的價值觀，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連結的。

價值觀念既為民族文化認同的組成部分，又為何須單獨提出來？這是因為主流價值觀念關乎信仰。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是一個沒有精神支柱的民族，一個沒有信仰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綱紀、倫常和規則標準的社會。沒有信仰，一個民族和一個社會就失去了靈魂、目標和方向<sup>70</sup>。在許多民族和社會中，宗教提供了一套主流價值觀念，做為社會之信仰基礎，甚至是社會規範基礎。例如，在美國和歐洲的社會，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等分支）提供一套主流價值觀念，也是其社會規範基礎之一；在回教國家，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提供者，則是因教。但是在中國，卻一直缺乏宗教形成的土壤，這對於中國之民族團結並不是一件好事。美國歷史學家 Adrien Hastings 說過：「每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宗教所塑造的，在這一點上，宗教與語言有同樣的力量。」<sup>71</sup>在西方，宗教與民族意識、國家團結的關係非常緊密。據一項在 41 個國家中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宗教與國家意識是成正比的：人民對宗教重要性的認同程度越高，則對國家的自豪感越強。而另一項在 15 個國家所做的調查，也指出：「在每一個國家中，認為宗教在生活中不重要的人，對國家的自豪感和認同感也相對較

---

<sup>67</sup>周曉陽、張多來。〈論中國傳統文化是江澤民思想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船山學刊》，(3)。2004 年。

<sup>68</sup>李向國。〈論胡錦濤「以人為本」的「民本位」思想〉。《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08 年 06 月 12 日。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82288/83849/83857/7374564.html>(閱覽日期:2013.2.26)

<sup>69</sup>李建敏。〈中國傳統「和合思想」推動當代和平外交〉。2005 年。

<sup>70</sup>潘一禾。〈「非傳統」視野中的當代國家文化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2)。2005 年，頁 36。

<sup>71</sup>Adrien Hastings 著，哈遠新譯。《基督宗教簡明史》。台北：啟示出版社，2006 年。

低」。相對而言，大部分歐洲國家的人民比較不認為宗教生活重要，故對國家的自豪感也較低，而美國人與愛爾蘭人、波蘭人則排在前列，他們相信上帝，因而也相信國家。<sup>72</sup>

在中國大陸社會尚缺乏宗教提供了一套主流價值觀念，以及中共必須理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與其政權屬性之關係的客觀條件下，目前中共為了建構其文化安全的精神基礎，乃將當前其所竭力提倡的「中國社會主流價值體系」劃分三層結構，定義如下：<sup>73</sup>

**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思想和「三個代表」思想，構成這個主流價值體系的第一層；以「民族精神」構成主流價值體系的第二層；以公民道德構成第三層。**

中共欲使之成為當代中國大陸社會之主流價值體系，並正不斷透過種種宣傳工具、管道，倡議：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絕大部分人民的文化利益之所在。事實上，這也是中共的「文化安全」之所繫，是其所欲建成的「社會主義中國」安身立命之根基。

總而言之，在中共政權眼裡，透過上述三層結構劃分之文化價值子系統的建構和相互聯繫，可使中共在主流價值觀念的塑造問題上，順利將國家的文化利益與中共的文化安全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

### 參、強化中國的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對中共而言，是一個極為新的、年輕概念。1988年中共的文化部國家工商局聯合發布了《關於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首次在中共的政府文件中，出現了「文化市場」這一概念；1999年，中共國務院才將「文化產業」第一次正式納入其國家發展計劃的政策視野中。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中，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十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推動訊息產

<sup>72</sup>Huntington, Samuel, "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4.

<sup>73</sup>俞可平編。《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年。

業與文化產業的結合」。這是中共第一次把文化產業的概念寫入黨的文件之中。至於什麼是文化產業？當時中共上下，包括學者專家的看法，仍然眾說紛紜。到了2004年，中共國家統計局制訂《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05年中共國家統計局再度聯合相關部門，制訂《文化及相關產業指標體系框架》，正式將「文化產業」定義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並由此定出對文化產業的分類。<sup>74</sup>

在上述2004年中共國家統計局制訂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之標準，中共將其文化產業，依產業對「文化安全」之重要性、影響力高低，依序分成「文化產業核心層」、「文化產業外圍層」及「文化產業相關層」，內容分別如下：<sup>75</sup>

- 一、文化產業核心層：指涉及到新聞服務、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電影服務、文化藝術服務等四類的產業。因此本層產業係屬「大眾傳播」性質的文化產業，直接涉及到中共對中國社會在「意識形態」面向上的文化安全管制，故列為核心層。
- 二、文化產業外圍層：指涉及到主要是與旅行、健身、廣告、文化租賃、文化仲介代理、會展等相關的服務。
- 三、文化產業相關層：指涉及到主要是與文化休閒娛樂相關的服務，及網絡服務和其他文化服務。

至此，中共才對其文化產業的重要性、管理分類，以及相應的管理措施等概念和政策逐漸成熟，並對文化產業做出戰略定位與規劃。尤其近幾年來，因「軟實力」之國家安全戰略新概念的提出與衝擊，中共對其文化產業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角色越來越重視，體認到文化產業除了是一個會在經濟上創造越來越可觀產值、占GDP比重越來越高的新興產業經濟活動（即屬「硬實力」）之外，在國家安全戰略上，它也是中共發展「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文化產業於今在戰略意義上具有雙重的屬性——既有經濟屬性也有意識形態屬性。中共學者侯貴文、栗志剛對此即曾指出：文化產業「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有機結合」。<sup>76</sup>

<sup>74</sup>王佐書。《中國文化戰略與安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88-189。

<sup>75</sup>王佐書。《中國文化戰略與安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89-190。

<sup>76</sup>侯貴文、栗志剛。〈文化軟實力研究述評〉。《理論月刊》，(9)。2008年，頁153-155。

另外，有一些大陸學者在評估當今大陸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價值時，也會特別指出：「傳統產業只具有『硬權力』，但文化產業的軟硬權力兼有，這就使世界各國政府都不敢放鬆對文化產業文化主義的促進。中國政府在面對美國等強大帝國文化主義者，以文化產業做為政、經與文化勢力的支撐槓桿，必然要發展自身的文化創意產業，從而成為發展中國文化安全政策的重要方向。」<sup>77</sup>兼有軟、硬實力，乃文化產業所獨有之戰略特性。這正是促使大陸官學兩界，對於當今之發展中國文化產業，如此的集中強調的主因。

#### 肆、提高中國的文化創造力

所謂「文化創造力」，就是一個民族立足傳統文化資源，吸收借鑒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成果，對於本民族之文化知識進行改造、更新的一種內在驅動力。而中國大陸學界依據對當前客觀環境的檢討，發現中共文化安全政策中的此項「民族文化創造力」提升，目前正面臨來自兩種方面的看不見的威脅。其一是來自於高端文化（high culture）層面的威脅：來自於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西方學術各種思想理論的「跟風膜拜」現象從未停止；其次，是來自在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層面的威脅：中國在流行文化上之創造力，與世界大國相比嚴重不足。<sup>78</sup>

對於上述來自高端文化之威脅，學者余英時先生早就曾憂心地指出：<sup>79</sup>

中國文化的危機至今仍在持續之中。一百年來，在中國文化界發生影響的知識分子，始終擺脫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若神聖」的心態。西方知識界稍有風吹草動，不用三五年中國知識分子中便有人聞風而起。所以清末的「神聖」是達爾文、斯賓塞一派的社會進化論，五四時代是科學主義、實證主義，三四十年代走馬克思主義，現在則是東方主義、解構主義之類。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歷史、文化、傳統的認識則越來越疏遠，因為古典訓練在這一百年中是一個不斷墮退的過程。

對於此現象，中共已有所警覺：除評估本身之文化創造力至今仍遠不及西

<sup>77</sup>俞可平編。《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年。

<sup>78</sup>俞曉秋。〈非傳統安全論析〉。《現代國際關係》，（5）。2003年，頁11。

<sup>79</sup>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頁1-31。

方，而有文化戰略上的自知之明外，對於外來西方文明產物，中共並不如余英時所形容的以「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若神聖」的心態對應。尤其是來自西方對其意識形態直接造成影響的學說，通常採取嚴苛的批判態度，並不照單全收，甚至會刻意加以隔離。例如，中共對外來宗教思想方面的學說與傳播，一向是刻意加以壓制；於中國大陸，宗教自由仍受到相當的壓抑。

至於在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威脅方面，中共當今也正極力在防制源於內在的中國文化之創造力不足，所衍生的外在文化安全問題。

中共在 WTO 關於服務貿易的談判中，對於被其列入「文化產業核心層」之一的電影產業，就採取嚴苛的保護措施，只承諾每年最多允許以分帳形式引進 20 部美國「大片」。然而，此種文化屏障措施，並不能實質克服美國在流行文化層面上的「威脅」入侵——盜版市場對此進行「補充」，美國影片剛剛在北美上映，美國本土還未發行 DVD，中國市場上便出現盜版 DVD，所以中國大陸觀眾根本不受這「20 部大片」進口管制的限制。好萊塢影片，一直是美國「文化霸權」和「文化侵略」的一種象徵，被戲稱為「文化軋路機」，意即所到之處，其他國家的民族文化無不支離破碎。美國電影協會主席瓦倫提（Jack Valenti）則被戲稱為「白宮戰士」，意指他執行美國政府指令，不遺餘力向外輸出美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這種美國流行文化難以實質抵制地進入中國大陸之現象，當然已被中共視為是一種文化安全上的重大「威脅」。故整體而言，流行文化的問題，當今也成為對中國大陸文化安全上的重要威脅。<sup>80</sup>

文化創造力是一個國家文化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力若被剝奪，對於其文化生命力將造成莫大的損害——對內破壞其文化認同和主流價值體系的樹立，對外壓抑其文化產品的分銷和價值觀念的傳播。故而，維護文化創造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和基礎。如果把文化競爭比喻為一場戰爭的話，那麼，文化產業的爭奪像是一城一地之得失，它是有形、可以量化的，然而與其同時發生的，強勢國家對弱勢國家文化創造力的侵害，則是無形但卻「傷筋動骨」，且是可能致命的。是以，積極開發中國的文化創造力，便成為中共在文化安全戰略上的重要佈局考慮。

---

<sup>80</sup> 俞曉秋。〈非傳統安全論析〉。《現代國際關係》，（5）。2003 年，頁 12。

## 伍、文化安全政策的戰略地位層次與相互關聯關係

此節最後，站在文化安全戰略之「整體」的立場，有關上述四者之關係，與其在戰略上所屬的重要性、戰略地位層次，吾人仍應加以明確釐清：

中共若無文化產業的發展壯大，則其將來在世界文化市場的占有比例，就會逐步縮小，甚至會導致其在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賽局中，逐漸落後而處於弱勢地位。但是，若當今中共在民族文化認同、主流價值觀念的保持上，也成了問題，則便談不上通過其文化產品向外輸出民族的價假親，於是，即使原本是壯大的文化產業與強勢的文化地位，也會消失而立刻在文化戰略上處於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因為，若沒有民族文化認同，一個民族即不知其何以異於其他民族，沒有歸屬感，也沒有存在的意義；若缺乏主流價值觀念，一個國家便無法塑造一種精神的力量以組織和動員人民，形成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的局面。相同的，如果不重視保護文化創造力，則民族文化便失去活力之源，民族文化便會逐漸枯萎，「文化大國」之地位也將不保。所以，民族文化認同、主流價值觀念的保持，以及文化創造力的保持與提升三者，都是一國文化產業的無形根基。

整體而言，在當前中共的文化安全戰略架構上，四者應是有機的相結合關係：民族文化認同和主流價值觀念的保持，是中共文化安全利益的根本；文化創造力則是中共「文化力」的重要動力來源；發展文化產業的政策，則是一種有形的發展力量和措施，但其成敗，仍取決於民族文化認同、主流價值觀念的保持，及文化創造力的提升等三者的妥善政策安排。

### 第二節 中共文化安全的機制架構

國家文化安全，是一個有著豐富內涵及廣闊外延的政策過程系統，而完整地建立這樣的系統，需透過許多的政策選擇和戰略考慮。對中共而言，確立以國家利益為取向的文化安全戰略，應是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行動準據。

對中共而言，經濟全球化主要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導引、推動的，是在平等競爭的口號下，實行有利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貿易戰略；而這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觀上的經濟戰略目標，實際上是在全球範

圍內強行推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所制定的國際經濟法則和規則。<sup>81</sup>故而，在對全球化的本質論述上，中共是以一種戰略觀察上的理解做對應的。中共基本上是把「全球化」視為是一把「雙刃劍」，把「文化全球化」視為是一把「更鋒利的雙刃劍」——認為它在給予中國有限機會的同時，也給中國埋下陷阱。<sup>82</sup>觀諸其他發展中國家近期文化發展的慘痛經驗，有關「全球化」現象對文化安全的威脅，更讓中共深自警惕。

本節以下，將針對中共文化安全在執行層面上的「機制」設計，進行說明。

## 壹、文化安全預警機制

對中共而言，「文化發展」本身已經成為其國家利益的重要部分。「文化力」的強弱，日漸成為中共「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參數和力量，對其國家利益日益重要。故當今中共在文化安全上，對整個文化產業、文化市場進行開發、控制、壟斷的競爭；進行「滲透」和「反滲透」、「入侵」和「反入侵」的鬥爭，已成為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施國際間國家利益爭奪的主要內容。如何有效地維護和保障本國民族文化發展及文化產業的生存與競爭力，即如何防止國家文化被侵蝕和殖民化，同時爭取擴大文化貿易上的利益，即爭取從國際資本、技術和文化市場上，獲得在文化產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市場占有率等文化安全利益，也就成為中共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戰略的兩個極重要環節。也就是說，中共當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其文化安全所實施的戰略主軸，包括精神形態和產業形態兩個「機制」面向。

由於全球化背景的催化，全球範圍內各種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趨勢銳不可擋，「文化全球化」的現象對中共的國家安全也漸漸成為重大挑戰——在產業形態上和精神形態的兩個層面上，對中共文化產業競爭力、傳統文化的存在與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維持等事項，均造成的嚴重的威脅和挑戰。<sup>83</sup>故而，如何建立積極的國家文化安全「預警系統」，實施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的「適度准入原則」，乃成為中共在這些問題上的重要的戰略考量事項。<sup>84</sup>

<sup>81</sup>宋效峰。〈文化全球化與中國的文化安全〉。《探索》，(5)。2005年，頁23-25。

<sup>82</sup>俞思念。《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文化創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3。

<sup>83</sup>姚冬梅。〈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文化安全問題〉。《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2（5）。2008年，頁118-120。

<sup>84</sup>俞曉秋。〈非傳統安全論析〉。《現代國際關係》，(5)。2003年，頁13。

事實上，當前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或區域組織，甚至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彼此之間，都會為了各自國家之文化安全利益，採取文化保護主義措施和建立文化安全的防範機制。例如，法國為抵制和限制美國文化娛樂產品在法國的銷售、傳播，為保護法國文化產業，規定法國的電視和廣播節目至少有 40% 的時間必須使用法語，並硬性規定其全國 4500 家影院所放映的影片中，好萊塢影片最多只能占四分之一。又例如，加拿大於 1995 年會將《美國鄉村音樂電視台》逐出加拿大，又為保護本國的期刊業，在同年開始實施 C-55 號法案。該法案規定，加拿大企業不得在加拿大發行的外國期刊上做廣告，否則將被處高額罰款。<sup>85</sup>此係加國欲透通過切斷美國期刊雜誌在加國的財源，從而達到保護本國文化安全之預防機制的具體政策表現。

基於對文化安全的警覺，事實上鄧小平早在 20 世紀的 80 年代初，就已在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同時，提出關於思想、文化領域裡的中共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在 1983 年，鄧小平曾針對西方文化威脅，可能對中共政權造成的「和平演變」危害提出警告，他指出：「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式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並告誡「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採取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後果就可能非常嚴重」，認為西方的文化滲透對中共政權而言，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問題<sup>86</sup>。鄧小平此一文化安全警覺，結合他後來所提出的要防止「左」和警惕「右」的主張，實際上就是意識到中共應針對文化安全威脅事項，建立一套防範性的預警機制。

文化安全預警機制的實質內涵，就是對某些具有文化安全威脅的事項或產品，建立屏障機制加以隔離，或實施對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的「適度准入原則」的制度，而非自由市場原則。

事實上，中共對其文化產業、市場建立「一道籬笆」的想法，也並非是中共基於戰略利益的獨有想法，囿於許多市場因素，也逼迫著大陸的文化產業行動、參與者們，與大陸官方的立場趨於一致。例如，著名大陸電影導演陳凱歌在成都舉行的一次電影會議上，曾絕望地指出：「內地電影現在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我不知道十年、二十年後，內地還有沒有自己的電影。」面對目前中國內地每年引

<sup>85</sup>陳定家編（2004）。《全球化與身份危機》。開封：河南大學。

<sup>86</sup>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4-55。

進的 10 部美國電影，就佔據 60% 的中國內地電影市場的局勢，「我們沒有絲毫的抗衡力量，甚至連一道籬笆都沒有」。在當前中國大陸的音像製品業，正遭遇取締不盡的盜版行為，而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的同時，中共評估認為：當前美國微軟（Microsoft）公司是在中國大陸實施「讓中國人盜版上癮」，繼而又追究中國人侵權的法律責任的商業策略，以此打壓中國資訊產業的計畫。<sup>87</sup>故陳凱歌上述的話雖語出驚人，但絕非危言聳聽。就現實上來說，這道出中共面臨文化安全嚴重威脅所產生的危急感，以及迫切希望能構築「一道籬笆」來防範文化入侵的強烈願望。

中共的國家文化安全預警機制，在政策內容上是在對中國大陸文化產業基本情況的廣泛調查、分析之基礎上，所實施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安全的「紅線」管制。尤其是它的早期報警系統，是中共通過對國際文化市場的文化商品流動趨勢的情資，及對以各種管道進入或影響中國文化市場所可能事致對中國大陸文化產業、文化市場發展構成威脅的各種預警情資，進行事前分析，對可能引發中國大陸文化產業發展不良後果的趨勢，及時而準確地作出預告性和警示性反應，啟動相應的國家機制，運用法律、行政等文化安全戰略管理手段加以管制。此外，並對可能危及中共國家文化安全的因素和力量，先期進行鑒定和識別，做為其文化安全政策之重要參考。<sup>88</sup>

另一方面，面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此內、外在需求與國際制約，目前中共對國際上的文化產業和資金及國內文化市場，也並非採全然拒絕、關閉的態度，而是採取在中共文化行政部門能牢牢掌握「國家文化主權」的前提下，進行有計畫的開放政策。其做法是：在上述前提下，有選擇、有步驟的、積極、適度地引進國際文化金融資本和輸入文化商品，以滿足中共文化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以及適度滿足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做法上是通過建立健全的文化法律體系，並根據關貿總協定及 WTO 有關文化投資自由化的原則，從中共文化殊榮發展需要的實際狀況出發，適當開放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的經營權，讓各種國際文化金融資本和跨國文化集團，在中國境內、在中共的法制規範下，從事合法的文化產業經營。

---

<sup>87</sup>陳定家編（2004）。《全球化與身份危機》。開封：河南大學。

<sup>88</sup>俞思念。《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文化創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56。

## 貳、「文化主權」與時代潮流的相結合的文化產業控制機制

中共對於其文化安全體系的構築，並非是以悖逆「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時代潮流為特徵，相反的，中共是在設法尋求與二者「相結合」的基礎上，來構築其文化安全體系。中共當前所推展的文化產業「民營化」政策，就是在這個思維下的代表性政策。這是中共基於對文化產業本質之深刻認識的一種反映——體認到一國文化產業強弱的表現，無論是精神層面還是產業層面的表現，實質上都是一國對其資訊的獲取、反應和控制的能力，以及其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的反映。畢竟，文化產業倘若不能在一個較高的戰略層次上，即從與現代先進科技和全球經濟合作同步發展的層次，去推進文化及其文化產業發展，那麼要想真正實現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目的，是很困難的。「民營化」政策，正是中共之國家機器在能牢牢掌握國家文化主權的前提下，實現前述「相結合」的初步政策。

在當今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趨勢銳不可當的背景下，想要靠閉關自守政策，而仍保有一國的文化安全，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故中共企盼要達到維護其文化安全的目的，而又不對當前中國大陸的文化產業及其文化本身之生存與發展造成傷害，就必須進行文化產業政策方面的戰略性調整，而非坐以待斃。對此一問題，中共初步是以「民營化」的手段，進行其文化產業結構調整以對。

在「十五大」中，會針對「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經濟制度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政策性闡述，認為：「在政府發揮的傳統性作用之外，民營文化產業在促進文化藝術發展中的作用，<sup>89</sup>已是世界文化產業發展共同面對的課題。而近年來，中共對此節的具體對應政策，就是實行文化產業及文化市場「適度准入原則」的同時，推出了文化產業的「民營化」的策略——以主動出擊國際文化市場的方式，開展全面的國際文化貿易，積極參與世界文化市場競爭，從而在「積極的民族主義」導引下，把對國家文化安全的維護，納入到一種更廣闊的「以攻為守」、充滿國際活力的文化競爭場域。也就是以「民營化」的手段，做為其文化安全戰略態度反守為攻的重要策略。以之積極面對文化安全挑戰，而非封閉式地逃避挑戰。

然而，目前中共所標榜的文化產業「民營化」政策，並不是要實行文化產業

---

<sup>89</sup>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總結了中國大陸20年來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經驗，第一次明確肯定，非公有制經濟與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一起構成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參考：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網站，<http://www.sh-syh.org/fgsxzzgz/2002-6.htm>（閱覽日期：2013.3.2）

的「私有化」，而是要在文化核心產業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社會化和公共化。試圖以公共的文化力量，來構築一種對中共既往之社會控制模式而言，屬於新形態的文化安全體系。毫無疑問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共當然要始終保持對文化活動的節制權力。這是一種在中共主管文化部門能牢牢掌握國家文化主權的前提下，所推進的「民營化」——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取代國家對文化的壟斷，也並不代表它可以將純粹的商業利益追求置於社會與文化效益之上。<sup>90</sup>尤其是當前這個文化安全體系，在對待、處理對意識形態很容易產生直接衝擊的文化產業時，例如在對待電視、電影、網路等「大眾傳播」領域的文化產業時，仍然堅守產業鏈中端國家的「三權」嚴格控制權原則：若將電視等大眾傳播產業之結構，視為由前端、中端、末端所組成的一個完整產業鏈的話，則透過中共當前文化安全體系的重系機制操作，對於電視等大眾傳播產業之「所有權」、「終審權」和「播出權」，中共仍然嚴密地掌控在手中；至於前端、末端的大眾傳播產、事業，則都向市場和社會開放。<sup>91</sup>這也說明了對中共的文化安全戰略而言，完全確保「適度准入原則」的自主詮釋權，是中共永保不變的基本戰略態度。此外，在中共當前的文化安全戰略佈局中，固有文化企業在整個文化產業中，依然佔據主導地位，中共並將之定位為維護其國家文化安全的主力軍。總體來說，中共在文化安全戰略管理上的基本態度之一是：保持國家機器的「適度介入」，以確保掌握國家文化主權，並以之做為其當前實施文化產業「民營化」策略的一個重要向度和理論依據。<sup>92</sup>

### 參、提升文化外貿能力

在中共的戰略視野中，追求文化貿易的順差，也是一個具有相當重要戰略意涵的文化安全目標。其原因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係數，不僅和這個國家的文化產業化程度密切相關，而且也與這個國家文化商品的國際貿易化程度，有必然的相關性。當一國的文化產業不能提供豐富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以滿足本國人民的文化消費需求，而這種需求又必須要得到滿足時，則這個國家文化商品的進出口貿易就會出現逆差；當逆差越大，則對本國文化產業所遭受到的發展打壓就越大，其文化安全係數就越小，當逆差越小，則對本國文化產業的國際打壓就越小，

<sup>90</sup> 俞思念。《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文化創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7。

<sup>91</sup> 潘一禾。《文化安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44-150。

<sup>92</sup> 宋效峰。〈文化全球化與中國的文化安全〉。《探索》，(5)。2005年，頁23-25。

一國文化安全的係數就越大。文化貿易逆差會造成本國大量文化的流失，為本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帶來制約性影響，而且還會造成外來文化商品大量擠壓本國的文化市場，其後果是對一國原有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和信仰取向等的文化安全精神基礎帶來嚴重的衝擊，並惡化這個國家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共官方及大陸學界，目前均極為關切此種文化貿易逆差現象對於中國文化安全的深刻威脅，並評估此現象在文化戰略上「是一種遠比一個國家文化流失嚴重得多的文化生存威脅」。<sup>93</sup>因而，追求文化貿易上的優勢地位，在加快文化外貿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組建和發展中國大陸本身的大型文化集團和跨國公司，<sup>94</sup>也被中共視為其當今整體文化安全戰略部署的重要環節之一。

長期以來，中共為意識形態所圈，在對外文化交往中，一直沒有專注於開展文化商品的國際貿易，也未發覺其在維護其文化安全方面的積極作用，因而一直忽視文化商品的國際貿易競爭力，以及其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商機。但是，於今中共對此的戰略思維與態度，已有的幅度的調整：已體認到國際文化商品競爭力是一國文化安全保障的重要機制——國家之文化競爭力，最終仍取決於其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而其文化安全體系，最終仍要靠強大的「文化國力」來支撐。也就是說，中共體認到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要進行國際文化競爭只有以更加積極的態度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國際文化市場的有利資源，才能充分發揮中國文化資源的優勢，進而提高其國際文化競爭力，同時也才能增加本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係數。否則，只專注於文化安全的內控機制，文化安全的維護與保障還是要落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依中共當前的文化安全戰略部署，中共在強化其國際文化貿易的改革工程中，上開「牢牢掌握國家文化主權」的前提，仍然是適用、並進的。中共對此所遵循的原則，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即：「進」（引進）要有所為，要把「好意識形態」進口；「出」（輸出）要有所不為，要淡化意識形態，突出文化型態，大力傳播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成果，實行無為而治、寓意識形態於文化型態之中的策略。<sup>95</sup>

<sup>93</sup>王書道。〈現代文化傳播與我國文化安全〉。《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2005年。頁66-69。

<sup>94</sup>潘一禾。〈「非傳統」視野中的當代國家文化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2）。2005年。頁38。

<sup>95</sup>潘一禾。〈「非傳統」視野中的當代國家文化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2）。2005年。頁37。

## 肆、建立與維護「文化創能力系統」

由於在戰略上中共始終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之文化戰略是要對中國實施「文化帝國主義」。因此，中共內部乃時時以警惕的心態，檢視其自身的抗拒能力和弱點所在。對此，中共學界所討論得出的之結論，大致是以下的論點：認為文化安全之理論儲備不足，及文化創新能力不強，是制約中國文化發展、從內部構成中國文化安全問題的一個主要因素；也正是這樣的不足，使得中國大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為「文化帝國主義」者實施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的受害對象。<sup>96</sup>

在「文化創新能力」的檢討方面，中共在檢討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大陸對外文化貿易逆差擴大的現象時，大陸學界曾提出以下的一個總結性的結論，認為：在中國的對外文化貿易過程裡，類似像國際版權貿易方面的巨大貿易逆差現象之所以會出現，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化市場確實鮮有稱得上是「創新」的產品，引起世界關注的相關理論的出現。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大陸的思想理論界，並沒有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格局變化中，表現和達到一個大國應有的文化安全理論思維高度，另一方面，中共的文化商品競爭能力，也未隨著經濟建設之提升而相應、提升，正處於一種整體國家實力發展的失衡狀態。相反地，這段期間中國大陸卻已大量引進的各種西方學說、思想和電影及各式各樣的文化商品和流行文化，這些西方的文化引進，又影響和制約著中國大陸文化界原創能力的發展。<sup>97</sup>

至於該如何提升中國大陸的文化創新能力呢？針對這個問題，大陸學者潘一禾曾提出以下一個綜合性的、以依賴中共之「政府治理」為思考主軸的建立「文化創新能力系統」的主張，重點如下：

首先，他認為文化創新能力在議題性質上，是「以對個人文化創新能力關注為核心，以對群體文化創新能力的提高為宗旨，聚焦於國家整體『創新能力體系』的建立與完善。」的政府政策。因此，中國大陸要實現文化創新能力的提高、克服對西方文化的能力依賴，首先政府就必須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學術界和藝術界，積極借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創新精神。

<sup>96</sup>陳定家編。《全球化與身份危機》。開封：河南大學，2004年。

<sup>97</sup>王書道。〈現代文化傳播與我國文化安全〉。《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2005年。頁66-69。

其次，政府也必須改變既往的文化管制做法，其要點包括：其一，廣開言路，在中共「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言論自由」範圍內，鼓勵人民在文化領域進行原創，加大國家對「文化創新能力系統」建設的政策投入；其二，健全和完善「文化產權保護體系」，建立嚴格的對侵犯言論自由和知識產權的懲治措施，維護公民在精神文化原創領域的合法權益；其三，撤銷各種違反文化平等和超國民待遇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法規，以建構合理、良性的文化競爭機制，提高文化原創的活力；其四、建構國家「文化創新能力系統」建設，經由建立各級政府，特別是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和文化學術界之間，公共部門和文化人、學者個人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共同推進國家「文化創新能力系統」之建構所需的思想、觀念和理論之出現。<sup>98</sup>

依潘一禾上開之要旨，在這個建立中國大陸「文化創新能力系統」的過程中，中共政府既是國家文化戰略發展的制定者，同時也是建設中國大陸「文化創新能力系統」要素的組織者和合作者。他認為只有依賴政府之上開系統性文化政策作為，中國大陸的文化和文化產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獨立自主的發展，同時，中共政權也才可能獲得文化安全對保障。

潘一禾之此一「政府治理」觀點，具有在現實上的可操作性，同時也符合中共當前的內、外環境現況，很可能成為中共將來在「提升文化創造能力」這個議題上的政策走向。其理由為：

其一，對於文化發展的議題，中共向來是把它放在意識建構的社會上位結構的政策來看待。故認為它是事關中共政權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性重大問題，中共不可能聽任中國大陸的「社會」自行發展「文化」，而會通過政府之干預、管制、主導，或做有指向的導引。這一點是不可能改變的。

其二，假設大陸的「社會」真的有一個所謂的「文化創新能力系統」存在，那麼，現今在「政府萬能」的時代，「政府管理」之文化發展角色，是不可免除的，而且必然是重要的。這一點已是中外皆然。

---

<sup>98</sup>潘一禾。〈「非傳統」視野中的當代國家文化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2)。2005年，頁38。

### 第三節 中共文化安全的決策機構與決策行為者

一國文化安全機制的行為主體是什麼單位或個人？此問題事關文化安全政策的所屬問題，也就是事關「是誰的文化安全政策」、「誰有權制定文化安全政策」的問題。文化安全政策主體的結構，會因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國家性質與形式、政黨制度、文化體制而存在差異。但就中共文化安全政策主體的形式而言，由於中共政權擁有對整個中國大陸社會資源進行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的權力，其價值選擇，對於某些文化安全制度能否進入政策議題，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中共事實上是通過其對中國大陸社會的統治行為，來體現其國家文化安全的意志，和實現中共對於文化安全的戰略管理。此乃當代中共文化安全之政策與管理上的普遍特徵，<sup>99</sup>而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文化安全政策，係其社會結構、社會規範本身的體現，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共的「中樞決策系統」正是制定其文化安全政策「整體性」內涵的主體，即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的機構。而某些形式上屬於「個體性」存在的文化安全政策與措施，則是由文化安全的「行為體」來完成，這些「行為體」包括決定個體性文化安全政策的中共文化管理機構，及協助其完成此類文化安全政策、措施的「事業家」。本文以下，將針對中共文化安全政策之「整體性主體」與「個體性主體」兩個層面，分別說明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管理架構中的「機構」。

#### 壹、文化安全政策機構：中共的中樞決策系統

中共的中樞決策系統，即決定其文化安全政策的核心機制，係由中共政權的「政黨統治集團」（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所屬機構為主要權力分配者）、「國家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及「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系統的文化行政部門）等之機構關係（文化安全政策之權力關係）所構成，為中共文化安全政策之「整體性主體」。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 一、以「中共中央」為主體的「政黨統治集團」

通過建立「政黨制度」來實現對國家政權的有效掌握，和對國家事務的管理，

<sup>99</sup>門洪華。《建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是現代民主、法制國家的主要政權形式，也就是政治學上所說的「政黨政治」的主要內涵。無論是「一黨專政」還是兩黨輪流執政，或者是多黨聯合執政，也無論是通過武裝奪取政權，還是通過競選獲得政權的政黨，一旦成為執政黨或執政黨聯盟，政黨或執政黨聯盟就具備成為統治國家的實質地位，成為「統治集團」於是就享有制定包括文化安全政策在內的國家政策的權力，取得參與文化安全政策決策制定的主體資格。<sup>100</sup>對中共而言，由於認國家性質有其「階級性」認知，<sup>101</sup>認為文化安全政策主體在行使文化安全上的統治或管理權力時，不管是以哪種方式制定政策——無論是由執政之「統治集團」直接制，還是在執政黨的綱領原則下由政府或由國會（議會）制定，都被中共認為是一個「政黨統治集團」所代表的「階級文化利益」和「階級文化意志」的反映。「政黨統治集團」的意志與利益，在中共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管理的政府決策系統中，具有重要的規範與引導作用。

中共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依其憲法規定，中共在政黨制度上，係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愛國統一戰線」概念，來規範政黨關係；並把政黨政治的內涵，規範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sup>102</sup>故除了形式上中共政權實行的政黨制度，與西方國家即有根本的區別外；在實質上，中國共產黨一黨具備「專政」的地位，其他民主黨派則只是形式上的權力陪襯者。

中國共產黨的實質「專政」地位，決定了它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享有國家所有文化政策制定的主體地位和決定性作用——通過中國共產黨對國家事務所實行的「政治領導」使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經過法律程序變成國家意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安全政策，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文化安全政策。

雖然中共在 11 屆 3 中全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名義上不

---

<sup>100</sup>門洪華。《建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2005 年。

<sup>101</sup>列寧。《國家與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sup>102</sup>「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序言」規定「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專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組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再包攬國家機關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實質上涉及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往設、發展的一些深層次的文化政策和大政方針，做為文化安全政策決策主體的中國共產黨，依然直接發揮決定性主導作用。而「中共中央」及其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在中國的文化政策中樞決策系統中，則是主體中的主體，規定和制約著其他成分。<sup>103</sup>事實上，「中共中央」正是中共國家安全戰略「整體」的領導者。在目前的領導體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其國家安全戰略之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所屬機構，包括「中共黨中央直屬事業單位」和「中共黨中央直屬工作機構」則為其國家安全戰略之工作機構。1997年4月21日，中共於「中共黨中央直屬工作機構」中，增加建置「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做為目前中共文化安全的決策過程中，實際的樞紐性工作機構。

「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屬的指導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的議事機構，實際上是目前中共掌控全國意識形態的機構，主管全國宣傳及意識形態。其日常工作，實際由「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為部級機構，簡稱「中央文明辦」）負責處理。該委員會成立後，由丁關根擔任首任主任，李鐵映擔任副主任，劉雲山擔任辦公室主任；到了2002年，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負責文化、意識型態事務的常委李長春出任主任，劉雲山升任副主任，胡振民任辦公室主任；2003年，陳至立兼任副主任；2004年，吉炳軒出任辦公室主任；現任主任為劉雲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副主任為劉奇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延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辦公室主任為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雒樹剛，辦公室副主任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建平、國務院副秘書長項兆倫擔任。<sup>104</sup>

## 二、國家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

現代的國家立法機關，主要為國會，由全國性的人民代表組成。一般現代國家的文化安全政策建議和主張，在法律形式上只有經過國家立法的立法律程序，

<sup>103</sup>門洪華。《建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sup>104</sup>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B2%BE%E7%A5%9E%E6%96%87%E6%98%8E%E5%BB%BA%E8%AE%BE%E6%8C%87%E5%AF%BC%E5%A7%94%E5%91%98%E4%BC%9A>（閱覽日期：2013.4.28）

才能成為國家行為和國家意志的一部分，其文化安全政策也才能具有合法性來規範社會文化行為之地位。<sup>105</sup>在中共政治體制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政權的國家立法機關，有權制定、認可、修改、補充和廢止國家的法律。在憲法意義上，它是國家的政權機關，或稱權力機關。依中共的國家法律結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擁有使文化安全政策合法化的立法權，也有督促行政、司法機關，使文化安全政策得以妥善、適當實施的監督權力與檢查權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主要法律職能是制定法律，其中包括制定或審查通過文化安全管理事務中，許多重大和重要的文化安全政策、法律。例如，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關於我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的決議》等。這些文化法律一經實施，就成為規範全體中國大陸人民和機構之文化安全的政策。<sup>106</sup>

中共政權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議行合一的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其法律上的權力地位要點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擁有立法權，而且還擁有對國家行政、司法機關的監督權和檢查權，以確保行政、司法機關貫徹執行它所制定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故在法律形式上，它具備使中共之行政、司法機關的文化安全相關管理措施、活動，限制在國家的法律和文化政策的框架範圍內；故在法律效力的位階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文化政策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有關文化安全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都不得與之相抵觸，一旦發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有權依法撤銷或糾正。

從文化法制的立場而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文化安全法律和政策，是中共最終、最高的決定權力。相對地，在法制上中共中央所決定的文化安全政策，若要成為國家文化安全之行為，仍必須經由行政機關的途徑提請立法機關通過或批准的程序，才能使中共黨的文化安全政策變成國家的文化安全政策，對全體人民和機構的文化行為才具有法律約束力。<sup>107</sup>

但在權力的實質分配上，「中共中央」才是中共政權的文化安全政策決定機構。在中共的文化安全中樞決策系統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雖依法擁

<sup>105</sup>門洪華。《建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sup>106</sup>夏蕾。〈中國文化安全問題研究〉。《法制與社會》，(7)。2007年，頁699-700。

<sup>107</sup>夏蕾。〈中國文化安全問題研究〉。《法制與社會》，(7)。2007年，頁699-700。

有法律形式上的國家文化安全政策之立法、監督與檢查權力，但實際上仍然必須服從於「中共中央」——通過中共黨的組織領導體制，即中共中央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之黨組織的領導體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國家文化安全政策的權力分配，仍然只停留在附屬性的角色。這與一般西方民主國家國會扮演實質權力分配者角色之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 三、國家（國務院體系）文化行政機關

國家行政機關，即學界所通稱的狹義「政府」。中共的國家行政機關，為國務院及其所屬機構。它是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行政執行機構，在中共中樞決策系統中，也是直接執掌國家文化行政權、從事國家文化事務管理的國家機關，是中共文化意志的直接執行者和體現者。其在文化安全政策的執行上，主要負責機構為國務院所屬的文化行政部門——文化部、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新聞出版總署等中央文化行政部門，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的文化行政機構。它們也都是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管理中的國家權力執行機構。

### 四、「政黨統治集團」、「國家立法機關」與「國家文化行政機關」三者文化安全政策上的權力關係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及各級國家文化行政機關三者，在中共文化安全事務上的權力關係，主要如下：

（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角色：為法律上的權力機關，但實質上的文化安全權力角色，是為行政機關的文化安全政策服務的。依法國務院文化行政機關是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及由其賦予的行政立法權，來制定文化安全管理上的法規和政策。這些法規和政策，導引、規範中國大陸公民和所有社會組織的文化行為，並處理和解決社會之文化矛盾，使中共的文化意志通過文化事業、產業的實行，確保中共的文化安全，維護人民合法文化權益和社會正常的文化秩序。<sup>108</sup>

（二）國務院文化行政機關的角色：中共之文化安全戰略管理的權力對象，有其針對性，這個特點使得國務院文化行政機關在中共之文化政策決策系統中，

<sup>108</sup>紀少峰。〈論中國共產黨四代領導人的國家文化安全思想〉。《科學論叢人文科學》，（4）。2007年，頁172。

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由於中共國務院對整個中國大陸社會之文化資源，擁有權威性分配的行政權力，國務院文化行政機關在涉及具體的文化政策問題時，會直接影響各種文化利益的再分配、文化力量的均衡和特定社會階段文化發展。為此，中共為保證文化行政機構所制定的文化政策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國務院文化行政機關設有專門的文化政策調研機構，目標在確保文化行政機構所制定的文化安全政策，能確實針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訂定的文化政策、法規在中共的「文化利益」上獲益，以保持高度的戰略一致性。<sup>109</sup>故國務院文化行政機關的角色，其實就是中共文化安全執行層面的樞紐性工作機構。

**（三）「中共中央」的角色：**透過各種黨對國家機關、機構之組織領導，以民主集中制之領導體制（實質表現為服從上級黨組、服從黨中央）控制國家立法機關之文化安全立法權，也控制國家行政機關之文化安全行政權。

總體上來說，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的整體及其管理工作，透過上述中共的「中樞決策系統」之機構權力關係安排，實質上被「中共中央」牢牢地掌控。

## 貳、文化安全政策的決策行為者

如果從中共「中樞決策系統」的視角觀察，影響中共文化安全最深者，乃中共對文化領域事務的統治能力。雖然「中共中央」誠如上述一般，透過「中樞決策系統」對中國大陸文化安全政策的制定，包括控制政策實體和制定過程，已經十足體現了「中共中央是文化安全政策主體」之地位。然而，真正對文化安全之決策起作用的，並不是作為「整體」的「國家機器」本身，而是啟動國家機器和執掌機器樞紐的「行為者」。在中共「中樞決策系統」中，究竟誰有權制定政策？或者說，誰是文化政策的決策者？是決定中共文化安全政策主體之行動內涵的重要因素。因為文化安全的「決策行為者」才是推動中共「中樞決策系統」運轉的真正力量。因此，中共文化安全政策的「決策行為者」乃分析其文化安全政策主體構成的另一個重要面向。

這裡對「決策行為者」的認知解釋，可以分成理論上的決策行為者，以及實際上的決策行為者兩類；從另一個面向思考，也可以分成政治上的決策行為者，

<sup>109</sup>紀少峰。〈論中國共產黨四代領導人的國家文化安全思想〉。《科學論叢人文科學》，(4)。2007年，頁174。

以及法律上的決策行為者兩類。但不管如何分類法，此類「決策行為者」都是指：對中共文化安全的政策內涵，產生實質影響力的人。它包括以下二類：

### 一、「中樞決策系統」中的「決策行為者」

中共文化安全政策的決策者，是指直接握有國家文化統治權力，控制國家文化發展走向的文化安全權力行使人。現實上，它包括前述中共「政黨集團」、「國家立法機關」和「國家行政機關」等之機構的領袖，及其核心成員在內的文化政策「決策群體」。對中共政權而言，由於「全國人大」的領袖及其核心成員（常委會成員）等，在立法權等的「人大」法定權力運行過程中，往往是以中共黨的組織，尤其是「中共中央」的意志為意志的方式，參與文化安全的決策和政策制定，而其領袖人物往往又是中共黨的領袖人物，因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中共文化政策決策的實際運作過程中，權力地位恰好與其法律地位相反，其權力分配比例，並不如主管文化安全事務的中共黨組織和行政主管部門的領袖、機構負責人或其決策群體。

以「中共中央」為首要的「政黨統治集團」，是中共文化安全「中樞決策系統」中最重要的、最有影響力的決策群體部分，而且，在中共的黨政一體、黨政難以分開的政治體制下，中共常常是通過由其黨的主管文化安全機構的領導人或實際主管成員，擔任國家文化行政機關的決策官員，直接行使國家文化安全管理的權力，並以這種權力關係，來體現「中共中央」在國家的文化安全生活中的權力地位和統治能力。在這種權力關係架構下，中共黨所代表「階級文化利益」和「階級文化意志」，也是通過它的領袖人物，和其黨與行政機關文化安全主管部門成員的行為來實現。從這角度分析，「中共中央」的領袖人物和其文化安全主管成員的決策行為本身，就是當前中國大陸社會在「文化關係」上的具體反映。這一點，造就中共「文化安全政策」本身性質的雙重性：一方面，它是中共黨的集體意志和文化思想的化身；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共文化安全政策之決策者（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領袖人物和其主管成員）之個人性格的表現。<sup>110</sup>

### 二、文化安全的職業專業家

---

<sup>110</sup>紀少峰。〈論中國共產黨四代領導人的國家文化安全思想〉。《科學論叢人文科學》，（4）。2007年，頁174。

當前中共文化全政策的「決策行為者」，除了上述的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領袖人物和其文化安全主管成員之外，尚包括這些決策者們的「智囊」人員。由於文化安全政策的「決策者」們（即決策主體），通常是在相對穩定的文化結構和政治制度下工作，受到特定的制度和法律的規範所約束，使得他們沒有太多的時間、條件和機會去直接感受、熟悉和了解人民大眾的文化需求，和亟待解決的文化問題。而決策本身又需要他們掌握和預見未來的社會文化形勢。因此，建立完整的文化安全決策諮詢系統，即利用「外腦」或「智囊」，來獲取廣泛的、多種多樣的文化安全資訊與政策建議，就成為主管文化安全的「中共中央」領袖人物和行政部門成員不可缺少的重要決策手段。進而，構成中共文化安全的「決策行為者」群體，除了決策者之外的另一個群體——「職業文化政策事業家」即中共的文化安全政策智囊人員。<sup>111</sup>

中共的「職業文化政策事業家」是指：以提供中共文化安全戰略管理之設計為工作內容，專門從事文化安全政策研究，以提供文化安全決策主體決策諮詢的人員。他們為中共黨和政府的文化安全政策主管機構，提供文化安全的理論模式和政策備選方案。這些人員專門從事文化安全政策分析，其中也有部分人員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社會文化行為或文化安全戰略的研究。他們有的任職於黨政機關的職能部門，例如「政策研究室」、「發展中心」等研究單位，或者是在大學和研究所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因此，這些「職業文化政策事業家」們，在權力結構上存在著縱橫兩種不同的層面：就縱向而言，這些「職業文化政策事業家」們的角色，有的是專門從事國家文化安全政策和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研究，並擔任中共國家安全之「文化安全」層面的決策諮詢；也有的是專門從事地方文化發展戰略研究，和為地方文化政策決策提供設計意見和備選方案。就橫向而言，這些「職業文化政策事業家」們的角色，有的專門從事意識形態研究——為中共之文化安全戰略提供理論依據；也有的專攻文化經濟政策研究，直接為文化經濟政策、文化產業政策和文化市場管理提供決策諮詢。由於這些「職業文化政策事業家」對於自身所負責的工作對象和研究領域的歷史發展，有較多的觀察和瞭解，故就其專業領域言，他們與現實社會文化的聯繫要比決策領袖們要深入得多。就某些文化安全議題而言，他們的瞭解狀況也要比文化安全行政部門的主管人員深入。從

---

<sup>111</sup>湯萬文。〈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國文化安全〉。《理論與現代化》，(2)。2007年，頁117-120。

而，這些「職業文化政策事業家」們，有機會實際參與中共文化安全之政策決策過程，因而對中共的文化安全戰略及其管理，有實質的影響力。



## 第肆章 中共文化安全的戰略架構

### 第一節 導引社會思想

#### 壹、發展中國的民族主義

中共自 1979 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上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重大成就。同時，此一經濟改革也推動了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的社會結構開放性轉變。但是，到了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緊縮的政治氣氛再加上中共當局的支持與鼓勵，使得中國大陸的社會思潮，又轉向新一波的保守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討論。民族主義的氛圍，再度散發並籠罩住中國大陸。<sup>112</sup>

##### 一、發展民族主義

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Ouara）從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之辯證整合的觀點，即從歷史與民族主義相互整合的角度，「解構」（de-constructing）中國的民族觀。他主張現代民族認同的內容與形式，是一種在現代民族國家架構內，與歷史認同相互對話後的產物。從這樣的理解來觀察中國，他認為 1911 年民國革命之前，中國知識份子對民族主義之辯論，是民族國家現代觀點與傳統原則的歷史觀點的辯論。從這個角度分析，杜贊奇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二者都是民族主義者，而二者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形式，就集中在較量各自將多少的歷史予以轉化，或是把各自的革命理念化成為民族觀念。<sup>113</sup>

儘管杜贊奇所提出來的觀點，對吾人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問題很具有啟發性，

<sup>112</sup>鄭國智。《中共對臺統戰策略之研究：公元 2000~2002 年》。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sup>113</sup>Praseniit Duara 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87-91。

但須注意到杜贊奇的理論，是一種對民族主義者主觀認知層面所作的分析他強調的是菁英對歷史的操縱而形成的民族概念。然而，造成這種認知的客觀因素是不能忽視的，吾人仍必須顧及時代、環境對中國催逼了什麼要求之後，再進行主觀層面的分析。以下即針對中共建政後，依照客觀環境對中共政權所形構的重大現實問題的角度，來分析中共的民族主義發展軌跡，並加以適當的詮釋。

### （一）毛澤東時期的民族主義

事實上，一般的早期西方學者，即認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民族形式的共產主義，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Signification of Marxism) 即為其顯要特徵。然而，中國這種自毛澤東以降的「民族主義復興」現象，並非只孤立地在中國大陸發生。在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裡，世界政治發展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全球範圍內抬頭：伴隨著各地區對自己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肯定，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大環境中，民族主義復興成為主要國際潮流之一。

「東方」做為一種西方的社會科學概念，常以「亞洲條件」或是「亞細亞生產模式」來進行論述；這也是馬克思和韋伯 (Max Weber) 認知東方的來源。簡言之，東方社會是被西方社會視之為落後、缺乏社會變遷、未現代化、以及沒有中產階級文化、沒有市民社會的社會，並以這些認知做為其對「東方」在民族識別上的特徵。從這裡開始，「東方」在概念上代表的是一種「差距」的集合或是一連串缺失的表列，缺乏社會階級、缺乏私有財產、在生產模式中缺乏歷史變遷。<sup>114</sup>此外，在馬克思和韋伯的觀念中，東方的國家政治，尚是專斷及具有不確定的性質。

自古以來，東方從來沒有做為一個單一的世界存在過。可是，在現實世界上，東方一詞確普遍存在。這中間所顯示的意義，乃在於東方是被當做西方的對立面

---

<sup>114</sup>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而提出來的一一原來西方人使用東方的概念，在於表達落後、停滯之意。但是，長期以來，非西方的各族人民，受到西方先進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優勢壓迫之下，所產生出來的逆反心理，也會使用東方這個詞，來向西方人表達反抗強權與保存自己文化傳統的意願。

從哲學的層次而言，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相對立的。民族主義以縱向的標準，意即從民族性，來劃分人類；馬克思主義以橫向的標準，亦即從經濟，來劃分人類。<sup>115</sup>因此，民族主義將革命建立在民族意識上，而馬克思主義將革命建立在階級意識上，二者是不相容的。事實上，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也是依循不同的工業化理論，並對現代社會提出相異的政治綱領。但從這個層面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卻也都是在面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時，所提出來的對應之道。二者最重要的共同之處，在於對新工業社會秩序合法性的無效，具有共同的認知。這裡的合法性即為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而二者最重要的相異處，則在於對國家角色認知的不同，民族主義視國家為滯後發展地區人民（the late developers）無可取代的保護者，在這一點上，也恰恰好與馬克思主義相反一一在處理如何保證滯後發展地區如何順利工業化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拋棄了國家。

從上述對「東方」與「西方」之對立關係的歷史詮釋，以及從「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哲學性內涵本質的相矛盾關係之說明，吾人應可清楚地得出以下論點：毛澤東所提倡之中國民族主義，對於西方社會及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敵對意識，也存在著政治立場上的對立關係。故對於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思想意涵，迄今西方學界仍存在若以下三種主要的不同詮釋方式：<sup>116</sup>

1.表示毛澤東犧牲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而以中國傳統與現實為優先。此說以舒勒（Stuart Schram）為代表。

<sup>115</sup> 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4)。2007年。

<sup>116</sup> 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2.是毛澤東為了跟國際派作權力鬥爭，所想出來的陰謀。此說以諾斯（Roben North）為代表。即認為毛澤東之民族主義，本質上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非真正的以民族認同訴求為出發的民族主義。

3.是毛澤東為了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適用於特殊民族條件，所創造的理論公式。此說以奈特（Nictick Knight）為代表。

但在事實上，這三種說法互不衝突。也就是說，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的對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不同的意涵。但是，就本文此處的主題而言，則須對上述的第二種說法的意涵，再做進一步的說明。有關毛澤東提倡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為了跟國際派作權力鬥爭的說法，筆者認為其意義應集中在毛澤東把民族、國家與階級結合起來，形成一套中國式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學說。而毛澤東運用這套把民族、國家與階級相結合起來的學說，雖然在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兩個目的上，獲得初步的成功，但毛澤東卻在「現代化」這個目標上，則走入歧途，並遭遇嚴重失敗，尤其是走了十年「文革」的「曲折道路」，使中國之「現代化」嚴重滯後。

1970年代後期，鄧小平領導中共政權，總結毛澤東有「現代化」這個中國民族主義目標上的錯誤經驗，重新以新的理論思想引導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

## （二）鄧小平時期以後的民族主義發展

在如何使落後發展的中國走向「現代化」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做了以下兩個戰略選擇（或稱「道路」選擇），而這兩個選擇，對後來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同於毛澤東時期的極大正面影響：其一是，鄧小平選擇了借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手段為工具，來建設中國的現代化，並將這個借用資本主義建設工具的歷史階段，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以此避開毛澤東所曾經嚴厲

反對的「走修正主義路線」的黨內批判，為其正要大力推展的「改革開放」路線，摒除理論思想上的致命攻擊。其二是，鄧小平同時選擇了繼續走毛澤東的中國民族主義道路。

並且，對於以上二個戰略選擇的「相結合」鄧小平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來做統一和總結。至此以後，「有意識地發展中國民族主義」之戰略路線（道路），在中共內部對於中國未來之政治、社會發展道路選擇之爭辯上，獲得了決定性的優勢與地位保證。

伴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政策所帶來的現實成就與收獲，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胡錦濤等，均繼續沿用鄧小平的上述戰略路線迄今。而「有意識地發展中國民族主義」，即依照中共的政治利益詮釋，來發展中國之民族主義，乃成為當今中共對中國大陸社會，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導引的主要政策內涵。

## 二、發展愛國主義

當今中共為了動員大陸人民繼續擁護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地位，正持續對大陸社會大力宣揚「愛國主義」。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不同，它不是一種理論，也不是一種意誠形態，而僅是對民族國家表現忠誠的行動、姿態，或奉獻和承諾。把 1990 年代，面對中國大陸之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革，中共的愛國主義在思想領域上，成為解決中共統治危機的一帖靈藥。所以吾人可以說：中共的愛國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一種面貌，是鄧小平理論體系的一個輔助說明，在 1990 年代，則是「江澤民領導核心」的一個精神支柱。

本文以下將從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關係，及愛國主義的淵源與發展情況兩個面向，來詮釋愛國主義在當今中國大陸社會思想上的角色與地位。

### （一）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

民族主義做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等於是民族主義對愛國主義提供了

一個理論的辯護，而愛國主義對民族國家的回報，則是民族主義所主張的機構承諾。在外觀上，它表現在向國旗敬禮、唱國歌等儀式性行為，甚至表現在為民族大義而奉獻生命。<sup>117</sup>由此看來，愛國主義是從民族主義所派生出來的一個概念——一是包含於民族主義的一種政治宣示。總體而言，愛國主義是包括在民族主義之內的概念，由國家所發起，它的第一個目的，在於保護國家避免於分離瓦解，其次在於增強政權的合法性，凝聚人民的認同感。

## （二）中共愛國主義的淵源與發展

根據巴特摩爾（Tom Bottomore）與普蘭查（Nicos Poulantzas）的說法，基本上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民族主義的理論，在政治方面，馬克思主義著重在資產階級國家之壓迫層面的具體分析，並提倡國際主義，所以也並沒有愛國主義的意涵。但列寧卻強調：「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顯然，列寧的愛國主義已取代了在馬克思主義的「工人無祖國」口號。在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之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是辯證統一的。在列寧的此種主張下，理論上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相結合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它的前提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只有一個祖國，而且不能有傳統民族主義的意義在內。在列寧的主張裡，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是奠基在國際主義之上的對蘇聯的熱愛。這其中，沒有任何一點特殊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訴求在內。<sup>118</sup>所以，列寧愛國主義的形式雖然是民族的，但其內涵仍是共產主義，因為它的最終的目標取向，還是階級鬥爭和國際無產。

中共承襲列寧思想對愛國主義所作出的解釋，同時，又擴大了愛國主義的範圍。它包括：是一種思想、行為和情感；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是一個歷史範疇，有著剝削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分類。然而，中共這種擴

<sup>117</sup>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sup>118</sup>鄭國智。《中共對臺統戰策略之研究：公元2000~2002年》。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大解釋的後果，在理論上卻存在無法調合的矛盾。<sup>119</sup>

是故，愛國主義是當前中共為了應付改革開放，以及後冷戰時期以來所面臨的內、外環境衝擊中，體認到政權的穩定性必須壓倒一切，因而向列寧思想借用的一帖社會思想導引工程上的特效藥——中共把愛國主義這面旗幟抬高到「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然而，中共之愛國主義同時也會不可避免地把原來位居全黨指導地位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略去，而且，也會使鄧小平理論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再被提及。這是思想取向上的內在矛盾所致，中共迄今仍無法克服。故而，中共當今所大力提倡的愛國主義，事實上是思想上的「兩面刃」，是否是一帖維護中共之「社會主義政權」於不墜的良藥？在理論環節上仍大有疑問。

## 貳、推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

就中國共產黨而言，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已變成一種新的民族國家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其特徵除了保留民族國家的地位以對抗西方之外，尚帶有馬克思主義與本土文化緊張的歷史銜接矛盾問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曾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這象徵著毛澤東對中國「亡國滅種」的憂慮，因而，中共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目標，當時已經開始實質轉型。但是，毛澤東仍然把「反帝國主義」保留下來，以之做為中共在毛澤東時期追求現代化的精神指導，並且以強調階級鬥爭的反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這種民族主義。

毛澤東思想做為一種民族主義，卻在追求現代化上出現問題。它的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性質」。從中國的角度看，社會主義是一種異國觀念，而且從社會主義普遍性的主張來看，它也是一種霸權觀念；另一方面，包裹著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則須同時承擔了以下的義務：建立國家以便使中

---

<sup>119</sup>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華民族能夠生存、發展經濟以抵禦帝國主義霸權，以及文化重建。<sup>120</sup>

而且這種義務，性質上也是與從「資本主義歐洲」起源的那種社會主義的義務相異的。

1949年之後，毛澤東在拒絕西方的同時，並沒有更進一步地轉向中國傳統文化認同。儘管毛澤東思想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合方式之一，是使用中國傳統文化的通俗語言，來闡釋馬克思主義，以求得最大的思想傳播與政治動員，但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性質是屬於現代性的，是屬於馬克思主義性質而否定傳統的，或至少是對傳統抱持懷疑的態度。故而，毛澤東思想並沒有向中國傳統文化靠攏。此外，若再回到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視野，來總結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則仍舊會發現：中共當今所大力倡導的民族主義內涵，與「現代化」之間，也是存在難解的內在矛盾。吾人如果把民族主義視為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現象，那麼倡導民族主義，是無法迴避政治發展這項課題。產生於西方經驗的民族主義本身，即帶有人民主權的意義。如同美國社會學和政治學教授格林費德（Lian Greenfield），所指出的：「人民主權與社會各階層的平等，是構成現代民族觀念的基本性質，它同時也是當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信條。亦即，在民族性的意義上產生了民主政治，二者不可分離」。<sup>121</sup>

歸納上述論點，若從推展、提倡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做分析，則在當前中共文化安全體系內占核心地位的民族認同問題，仍存在危機，而其根本原因，導自於以下三項與中共民族主義發展的相矛盾關係：

- 一、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內在衝突。
- 二、現代民族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
- 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

中共的改革開放，使這些抽象的理念衝突惡化、具體化，並以各種具體的形

<sup>120</sup> 廖永亮。《輿論調控學：引導輿論與輿論引導的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

<sup>121</sup> 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式挑戰中共權威的合法性。為此，中共當今領導人，乃改以強調「適應中國國情」的論述，試圖調和上述的理論內在矛盾，以推展對中國大陸社會思想導引的工作，克服政權穩定與現代化發展難以同時並進的問題。

針對中共民族主義與發展民主政治之矛盾關係的調和問題，鄧小平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處理「政治民主」問題時，指出：「中國在國際上處於落後狀態，中國要發展起來，要實現四化，政治局面不穩定，沒有紀律，沒有秩序，什麼事情都搞不成功。西方民主那一套我們不能照搬，中國的事情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辦。中國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同社會主義法制相輔相成的。中國正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122</sup>故鄧小平是以立足於「中國特色」的態度，做為中共處理上開諸矛盾問題的基本戰略態度。其後的中共政權領導人，也是嚴守這樣的發展道路選擇。

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於 2002 年 10 月 24 日訪問美時，在其發表的「為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部署』」的演講中，會特別點出：「中國 20 多年來發展的實踐證明，堅持改革開放，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符合中國的國情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而此前，他針對中共未來的發展路線，曾提出「三個代表」的主張。<sup>123</sup>此乃江澤民主張繼續走鄧小平之「立足於中國特色」發展戰略基調的具體證明。<sup>124</sup>

江澤民的繼任者胡錦濤，及甫交棒的「胡溫體制」，也是沿續這個道路，來向中國大陸社會推展主流價值觀。胡錦濤在 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的開幕式談話中，會明白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

<sup>122</sup>鄧小平。〈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1985 年 4 月 15 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16。

<sup>123</sup>所謂「三個代表」主張，是江澤民所提出的中共未來的發展路線原則，強調「我們將按照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各項社會專業，實現中國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

<sup>124</sup>江澤民。〈江澤民訪美談 16 大重申「三個代表」與「作出戰略部署」〉。2002 年 10 月 24 日。今日新聞網站。http://www.nownews.com/2002/10/26703-1367928.htm (閱覽日期：2013.3.8)

系。」他在該談話中，對於中共之現代化事業建設，主張要：「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後，也不是要脫離實際、急於求成，而是要堅持把它做為推進改革、謀劃發展的根本依據。」<sup>125</sup>

總體而言，中共自毛澤東掌政以來，即同時以民族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雙重身分，做為其領導中國選擇發展道路上的自我角色詮釋。自建政以來，中共也一直以這兩個理論上存在難以調和內在矛盾的價值理想，做為社會思想導引，和欲同時實現的政治訴求。進而，在實踐層次上，中共也一直被一種由其自我形構的矛盾框架所制約。這種制約，直接導致中共在毛澤東時期追求中團現代化的失敗。但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則改以總結歷史經驗，以「適應中國國情」的提法推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試圖調和「中共民族主義」與「中共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之間的矛盾，重新在中國之現代化這個議題上，建構新的實踐框架。

## 第二節 對「文化軟實力」之競爭進行戰略管制

眾所周知，「軟實力」是目前國內外政界與學界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它最初出現在冷戰末期，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1999，不戰而勝》乙書中曾指出：美國應積極運用其生活方式對世界的影響，來使東歐、蘇聯等國家的人們拋棄共產主義。<sup>126</sup>依照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S. Nye）的觀點，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所體現出來的「軟實力」。<sup>127</sup>這兩者是有區別的，硬力量是有形的、並且可以計算出來，而軟實力無法計算、變化很大、容易波動，並且在

<sup>125</sup>胡錦濤。〈中共十七大胡錦濤談話全文〉。2007年10月15日。Yam 天空-新聞網站。http://n.yam.com/cnyes/cbina/200710/200710015859058..html（閱覽日期：2013.3.8）。

<sup>126</sup>胡鍵。《中國軟實力：要素、資源、能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

<sup>127</sup>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2002, p176.

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著「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存在。

## 壹、中共對「軟實力」的認識與定義

當今就中共而言，在軍事「硬實力」還不強大的情況下，隨著經濟、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外交手段已日漸成熟，且其「和平」、「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也日有起色。這些都使中共在對外影響力方面日漸增強，這些就是中國目前最明顯的「硬實力」日增的象徵。<sup>128</sup>

按照 Nye 的定義，「軟實力」是指「影響他人選擇的力量」。對於國家而言，軟實力是一個國家令其他國家以其預期目標為目標的同化力量。<sup>129</sup>但由於軟實力與硬力量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因此自克萊恩（Ray S. Cline）以來，在分析綜合國力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分析模型全面涵蓋了軟實力的所有要素，而主要都是用不完全的列舉方式進行分類。其缺點是：由於整個國際社會都在不斷變化，有的分析者所列舉出來的要素並不具有典型性，結果導致重要的要素沒有納入分析框架之中。也有一些已經過時的要素，卻仍然被某些分析者列為考察的對象。目前，學界對軟實力構成的研究，主要是根據 Nye 定義而分解出來的結構模型。中共學界，當前這類分析模型研究，以黃碩鳳的研究最為典型。依據他的模型，軟實力包括三個要素：政治力、文教力、外交力。而此一解釋，也與我國學者宋國誠的見解相同。<sup>130</sup>另一大陸學者胡鍵，則將軟實力的觀察指標，再加上「社會力」一項。他認，從當前的國際環境來看，直接表現為中國大陸國家軟實力的要素，至少應該包括：<sup>131</sup>

### 一、政治力：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政體制、國家戰略、政府素質、國民凝聚

<sup>128</sup>胡鍵。《中國軟實力：要素、資源、能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2003 年。

<sup>129</sup>胡惠林。《文化政策學》。太原：書海出版社，2006 年。

<sup>130</sup>宋國誠與黃碩鳳的看法大致相同，把國家的綜合國力參考指標，分為「硬實力」的國防力、經濟力、資源力、科技力三項；「軟實力」則為政治力、文教力、外交力三項。宋國誠。《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公元 1990-202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頁 11。

<sup>131</sup>胡鍵。《中國軟實力：要素、資源、能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2003 年。

力等政治動員的綜合能力；

二、**外交力**：主要是指國家利益的實現能力、國家戰略的貫徹能力、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能力和全球公共品的運用能力等；

三、**文化力**：包括文化競爭力、文化投射力和文化信息力；

四、**社會力**：主要是指社會和諧程度、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社會發展水平。

## 貳、中共對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評估

大陸學界大致上是以「儲備資源」的角度，來評估中國大陸的軟實力。且對於中國軟實力的大小程度之評估，包括對文化力的估量，認為基本的原則之一就是不能進行定量分析，只能用強弱來衡量。進而，中共對其文化力之資源的評估，認為主要是從中國在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產品；不過，衡量文化資源的多少，不僅要看歷史文化的積累，也還要看這些歷史文化積累究竟對國家發展是積極的精神動力，或是消退的阻力。

誠然，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且其歷史發展脈絡從未被打斷，這種歷史的客觀事實，是造就中國成為一個文化大國的厚重資源。這是當今世界的「文化強國」中，中國文化所具有而其他國家文化所沒有的一大文化資源特點。胡鍵即會透過中共唯物史觀所劃分的歷史階段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發育之早、結束之晚，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相比。封建社會被視為落後的代名詞，那是在西方各國進入近代史以後的事，但當時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卻標誌著人類向文明社會邁進了一大步。」<sup>132</sup>故基本上，中共對於中國之文化力資源，是相當具有自信的，並認為當今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文化和社會文化，無不可以從歷史文化中找到其淵源；但是，也同時評估：中國文化也同樣使中國的對內對外行為，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故而，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要發展中國文化力的優勢地位，中共必須從新以一種戰略的眼光，即「文化理性」來做對應——依

---

<sup>132</sup>胡鍵。《中國軟實力：要素、資源、能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

照新的中共文化戰略部署，取中國歷史文化之強項，避開「傳統文化的消極因素對文化理性的影響」，來提升中共「文化力」的世界地位。

此外，中共基本上對於自身文化軟實力發展的現況，評估認為是極不足的，此與西方國家相較而言，是處於相當弱勢的地位。而且，也認為：與其他的國家實力的指標因素發展相比，尤其是與其「經濟」等硬實力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之狀況相比，現今中共的文化軟實力(文化力)發展程度是非常不相對稱。此一觀點，是中共基於對軟實力價值的新認知而發展的新戰略觀點。

當今，中共對於其「文化軟實力」在戰略上的需要性，無疑是非常企求的。基於中國大陸發展的整體性，中共認為在國家實力建設的概念範疇下，文化軟實力的內涵可以借助「軟實力」的工具性價值，內化為其國家行為，進而產生的影響力和驅動力。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致力於不斷提升國家整體力是水平的國家」而言，在繼續加快以經濟力量為核心的「硬力量」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以內生、內省、內驅力為前提和歸宿的文化軟實力建設，無論對於國家力量建設本身，還是對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提升，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價值。<sup>133</sup>

其實中共上述的戰略思維，是非常符合科學推理的。因為，中共的硬實力持續增強，已導致其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不斷提高，在此前提下，強調文化軟實力建設，是對其國家力量建設理念的又一創新，也是對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發展的補充和完善。<sup>134</sup>也就是說若在文化軟實力和硬力量建設的互動推進下，中共的國家力量構成將更加合理，中共將能夠更加有效地提升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

長期以來中共之國家實力建設以經濟成長最顯著，但此現象卻日益招致國際社會對中共的一種嚴重放大的反作用力——認為中共可能對現存國際體系構成的結構性衝擊。<sup>135</sup>因而，中共現階段以 GDP 增長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出

<sup>133</sup>劉杰。《中國軟實力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 年。

<sup>134</sup>廖永亮。《輿論調控學：引導輿論與輿論引導的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

<sup>135</sup>劉杰。《中國軟實力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 年。

現了嚴重的外部性市場制約和內部性資源短缺之雙重阻力。再者，中共估量其軍事力量建設，在「中國威脅論」的普通猜疑下，現階也不可能具有實質性的突破。這些現象都說明了，中共的硬實力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個轉型時期——必須改仰賴文化軟實力建設，來支持其硬實力的建設，以使中共的國家力量發展，能在良性的軌道上前進，以做為中共國際地位持續提高、國際影響持續上升的新動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幅減低戰略風險和隱患。

簡言之，中共在戰略上評估：中國若要從一個國際體系的挑戰者，逐步轉型為參與者和維護者，其在國家實力建設的整體比例，必然要調整成更著重具有和平與和諧色彩的軟實力建設，如此，才可能消解外部的不利因素。故而，著重發展文化軟實力，對其現階段的國家安全戰略而言，是極其重的。

### 參、中共對「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管理原則

綜上可知，中共對其「國家實力」的構築，不是建立在空泛的理論或構想之上的。而是認為在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應有不同的重點要求。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是中共發展國家實力建設的主訴求，對於軟實力的要求有所忽視。但在當前，中共則對其軟實力之發展，則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對於文化軟實力的加強，更為其當今的戰略重點。

其實，中共本來沒「軟實力」這個用詞，但在戰略的實質內涵上，卻早已存在。鄧小平在進行改革開放以後，就一直陸續在中共黨內，把實質上是「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管理概念，不斷地強調出來，這些戰略管理概念的發展歷程，大致如下：

一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降，即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即提出黨和國家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張，並明確提出其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其後，中共內部圍繞這個目標，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一系列闡述，並從「重

在建設」的戰略高度，試圖增強其文化安全。<sup>136</sup>

一到了「十五大」，其報告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並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著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sup>137</sup>

一到了中共「十六大」，其報告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sup>138</sup>

一在中共對抗 SARS 事件期間，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則順勢將中國大陸當時所正需要的「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團結互助、和衷共濟；迎難而上、敢於勝利」24 個字。他還強調指：「我們必須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深刻認識加強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在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的同時，更加自覺地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堅決防範和抵禦各種腐朽落後的文化觀念侵蝕幹部群眾的思想，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和社會穩定。」<sup>139</sup>以此作為中共文化軟實力建設的基礎性管理原則和發展目標。

一到了中共「十七大」，其報告明確提出：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開始把「文化軟實力」一詞用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

綜上可知，自 20 世紀末期以來，中共領導人確實是從「民族復興」和「社

<sup>136</sup>葉金寶。〈文化安全及其實現途徑〉。《戰術研究》，(8)。2008 年，頁 11-18。

<sup>137</sup>人民出版社。《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5-36。

<sup>138</sup>人民出版社。《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5-36。

<sup>139</sup>羊城晚報。〈胡錦濤強調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文化建設，確保 國家文化安全社會穩定〉。《羊城晚報》。2003 年 8 月 13 日。

會發展」的戰略高度，提出了文化安全的新問題，並把文化建設看做是文化安全的內在要求。亦即，中共實質上是把追求「文化軟實力」，提到國家安全戰略思考的高度來進行政策規劃。

#### 肆、中共「文化軟實力」戰略管理的工作面向

中共進行「文化軟實力」戰略管理的目的，是要提升其整體的文化安全。其目標包括：

- 一、提升「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力，即提升國際相對文化影響力的地位；
- 二、文化安全管制，即排除前項工作獲得提升的內、外在阻力因素。

為了實踐以上「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目標，中共所進行的政策措施，可概括為以下兩方面：

##### 一、實行必要的文化管制和文化保護

實行必要的文化管制和文化保護政策，是中共實現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徑。所謂文化管制或文化保護，是指中共現今所採取的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規範和思想方面的措施，以對文化活動進行調控。文化管制和文化保護政策，並非中共所獨有，而是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維護文化安全的途徑之一。例如，「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實施「宣傳指引」，要求傳媒不播發有關「基地」組織首領賓拉登的錄音錄影或講話稿。1989年，歐洲議會通過「無國界電視」命令，以確保播放歐洲影視作品的時間下限。1992年，歐盟認同法國的「文化例外」概念，並確定了界定「文化例外」的六條標準。1993年，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提出文化例外的主張，認為文化產品有其特殊性，不能與其他商品一樣流通；法國與其他歐共體國家一起，拒絕美國關於取消對美國影視產

品「賠額限制」和「自由貿易」的要求。1994年，印度、印尼等國在新德里召開15國高峰會議，共商防止西方文化滲透的對策。1996年5月在南非召開的「資訊社會與發展」大會上，法國、加拿大、日本等國代表強調：要保持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保持全世界各民族的優良傳統。<sup>140</sup>這些都是國際上實行文化管制和文化保護的例子。

由於中共當今處在文化力量與西方相比，是相對強弱差別巨大的特殊時期，故文化管制與文化保護，對中共而言雖然不是實現文化安全的治本之策，但卻是必要的政策。例如在中共對抗 SARS 事件期間，中共政府對一些流言、謠言，曾做了的強制性輿論管制，也有效地制止社會不穩定因素的進一步擴散，維護了當時社會秩序的穩定；又例如，中共在加入 WTO 之後，對其文化市場的開放做了一些承諾，但其在中西文化強弱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為確保本身的文化安全，也依據 WTO 的有關條款，制定相應的文化管制或文化保護措施。

## 二、實踐文化創新

在建政早期，中共文化安全的策略選擇，是以「文化控制」為主。但是，近期中共已發現，這種文化安全模式在新的時代潮流與客觀條件下，已經不適應中國大陸當今社會發展和文化安全的要求，無法達到實質的文化安全。所以，當前中共在戰略上，乃改選擇一種新的文化安全路徑——「文化管制與文化創新並舉，著重于文化創新」的新模式。<sup>141</sup>而此一模式的最重要促進因素，就是網際網路的新傳播管道的出現。

當前中共已深刻體認到：網際網路出現之前，人們瞭解資訊的管道主要是電視、廣播、報紙、雜誌，這些傳媒政府易於控制。而網際網路處於「無政府狀態」，也沒有國界，人們可以輕鬆、即時地獲得及發布各種各樣的資訊，政府控制資訊傳播的能力因而減弱。故近年來，迫於網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運用，中共要實行

<sup>140</sup> 祈述欲。〈國際文化競爭力與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國家行政學院學報》，(5)。2001年。

<sup>141</sup> 葉金寶。〈文化安全及其實現途徑〉。《戰術研究》，(8)。2008年，頁11-18。

文化管制和文化保護，存在相當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實現文化安全的根本之途，便落在「文化創新」一途。故而，中共現今的做法，主要是在通過「文化創新」，增強其文化的競爭力和國家安全上的「免疫力」。

當今中共在「文化創新」的目標上，主要設定為：要不斷揚棄、超越社會主義傳統上所理解的文化框架及文化理念，要不斷揚棄「五四」以來的現代革命文化傳統，不斷揚棄、超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務中感性和經驗的制約，建設具有前瞻性、指導性、穩定性的文化價值系統，為不同層級的人們提供安生立命之道，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精神系統的保證。<sup>142</sup>在「文化創新」的方法上，則揭示文化創新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人民群眾」為實踐之主體和價值主髓，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為立足點和落腳點，實現「三個方面的轉換」——即「思維方式的轉換」、「知識份子人格的轉換」、「文化體制的轉換」。並通過創新體制，使文化工作者的主體性、積極性、創造性得到充份的發揮。<sup>143</sup>亦即，在「文化安全」的戰略思維上，中共改採一種更能適應環境需要的開放態度，把其「文化安全」的實踐主體，由傳統上的中共和國家機器，轉換為社會知分子、文化工作者和普羅大眾，並在文化安全管理體制上，放寬控制力度，以增加「人」的能動性，藉以開發「文化創新」能力的活力。

### 第三節 傳播媒體之管制

#### 壹、中共對傳播媒體的戰略定位

就中共而言，傳播媒體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角色本質，有兩大面向：一是政治性的，它是中共「黨的喉舌」，是中共控制社會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二是經濟性的，它也是一個「文化產業」中的一個經濟單位或機構。因此，中國大陸的

<sup>142</sup>李宗桂。〈文化創新與民族精神的培育〉。《南方日報》。2002年。

<sup>143</sup>葉金寶。〈文化安全及其實現途徑〉。《戰術研究》，(8)。2008年。

傳播媒體具有雙重屬性，即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不同的傳媒，其雙重屬性的側重比例不同。例如，如電信媒體的產業、經濟屬性較強，而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等大眾傳播媒體，為中共所倚重的政治宣傳工具與喉舌，政治屬性表現就比較明顯。故若從中共對傳播媒體此「雙重屬性」的理論做推論，則其傳媒的戰略功能，應該主要有兩種，即產業功能和喉舌功能：凡屬於經營範疇的傳媒活動，大都是來自傳媒的產業功能的結果，其商業色彩比較明顯；凡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活動，則不管是無償的還是有償的，大都是中共傳媒的喉舌功能作用的結果。而且，中共對於其傳播媒體的此雙重屬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認為是缺一不可的，因為：對於傳播媒體「如果只強調其產業功能，否定其喉舌功能，那麼傳媒就不叫傳媒了，如果只講其喉舌功能，否定其產業功能，傳媒也就不能存在了」。<sup>144</sup>

## 貳、中共對傳播媒體的戰略管理

### 一、政治性面向的管理

#### (一)「國有制」的管制

當下中共也是從政治和經濟兩個面向，來影響和控制中國大陸的媒體管理。在政治方面，主要是以「所有制」來影響媒體功能。因為中共對中國大陸的媒體的定位之一是「黨的喉舌」，使得媒體在中共「國家」的政治運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國大陸媒體的所有制，迄今仍堅守實行「國有制」。

在中共的媒體生態環境中，公眾、政府和媒體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當今仍是以中共的政治體制為決定性因素，這一點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之由自由市場、產業功能決定的情形，有著根本的差別。除了「國有制」手段以外，配合此體制運作的配套措施與控制機制，也是極為嚴密而高效的，而其綜合效果，明顯的表現為：中共的政治力整體性的介入媒體管理制度之中。這些介入領域，具體包括：

---

<sup>144</sup>周鋒澤。《媒體產業制度論——周鋒澤自選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2004年，頁208。

媒體的行政級別、資格審批，以及高層人很任免、編輯方針、內容審定等涉及核心領域的媒體內部管理制度。

## （二）對外資、外國公司涉入媒體運作的選擇性管制

在涉外的媒體管制方面，隨著中共加入 WTO 的關係，中共對於媒體管制之經濟性面向有所放鬆，但在政治性面向，對於已列入其上述「文化產業核心層」之一的媒體產業，則仍堅守政治控制的原則。

在 WTO 架構下，中共在服務貿易的談判中，對於電影產業，採取嚴苛的保護措施；對於大眾傳播產業領域的電視、電影、網路等產業，雖然於產業結構的很大部分准許開放，包括對產業鏈前端、末端中，准許開放外資及外國公司以技術、經營管理、財務管理、知識產權等之方式投入，進行中、外合作之傳播產業上下產業鏈的國際連結，但是，對於大眾傳播產業之中端的經營權中，仍然是堅守國家的「三權」不放——以政治面向的思考干預媒體經營的「所有權」、「終審權」和「播出權」。<sup>145</sup>

總的來說，近年來，雖然中共對媒體管理制度的政治控制，整體上是有所放寬，而中國大陸傳媒運作的政治因素也有所淡化；但是，中共對於傳媒的政治性定位，並沒有絲毫改變。進而，中共對於傳媒的決定性管理並沒有弱化。亦即，中共對傳媒的「國有」屬性，和「黨管媒體」的基本政策，並沒有改變。故而，中共對於媒體產業的功能和喉舌的功能定位，也就不會有所改變。當今中共傳播媒體的首要任務，仍然是宣傳中共黨的政策和方針。

## 二、經濟性面向的管理

當前中共對傳播媒體在經濟性面向的管理和改革，主要著眼在於擴大其產業效應與全球競爭力的提升，即其「文化力」的角色提升。

---

<sup>145</sup>潘一禾。《文化安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44-150。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可說是中共近年來傳媒運營管理制度發展的直接推動力量。由於傳媒的市場競爭激烈，基於經濟利益的驅動，及配合近年來中共在「政治因素」上、在規章制度上適度對傳媒的管控方式做調整，使得中國大陸傳媒的產業能力迅速提高，同時也使得近年中國大陸傳媒在發揮傳統媒介和新傳媒的功能上，以及娛樂功能提升上，都得到普遍的認同。<sup>146</sup>在經濟面向的改革上，近年中國大陸傳媒在廣告運作和引進競爭機制等方面做了革新，提供了大陸媒體以更合理的成本進行制度創新，並推動大陸媒體在傳播職能、廣告發行、經營機制和資本運營的制度上做變革。整體而言，這個面向的改革，並未改變上項「政治因素」介入後的媒體生態環境。亦即：並未基本改變公眾、政府和媒體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但卻使中國大陸傳媒的產業效能與競爭力，獲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在經濟性面向的管理法制方面，中共近期頒布多項管理改革新法規，其中最重要、影響層面相對較廣的，是 2005 年 4 月 13 日國務院下發之《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之〔2005〕10 號文件。該《決定》涉及廣電大眾傳播媒體領域管理的內容，包括：<sup>147</sup>

- (一) 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電影電視劇制作發行、廣播影視技術開發運用、電影院和電影院線、農村電影放映；
- (二) 非公有資本可以投資參股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音樂、科技、體育、娛樂方面的節目制作，電影制作發行放映，其中國有資本必須控股 51% 以上；
- (三) 非公有資本可以建設和經營有線電視接入網，參與有線電視接收端數字化改造，從事上述業務的文化企業國有資本必須控股 51% 以上，非公有資本可以控股有線電視接入網社區部分業務的企業；

<sup>146</sup>張志安。〈試論經濟因素媒體管理制度的影響〉。2002 年。

<http://tecn.sina.com.cn/itile/2002-04-24/112973.shtml>。（閱覽日期：2013.3.26）

<sup>147</sup>北大法寶-北大法律信息網。《國務院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2005 年。

[http://www.zlx.gov.cn/gov/zhouluzhoulu678120\\_show.jsp?Im-id=zhoulu678120&data-id=zhoulu678120926](http://www.zlx.gov.cn/gov/zhouluzhoulu678120_show.jsp?Im-id=zhoulu678120&data-id=zhoulu678120926)（閱覽日期：2013.3.8）

(四) 非公有資本可以在符合條件的賓館飯店內提供廣播電視視頻節目點播服務。

### 三、對於「新媒體」(網路新聞傳播)的管理

此處「新媒體」的管理，主要指的是中共對於網路媒體的新近管理措施。為了規範網路媒體網站登載新聞的業務，維護網路媒體新聞報導的真實性、準確性、合法性，2000年11月6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信息產業部聯合發布了《網路媒體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其要點為：<sup>148</sup>規定網路媒體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法規。並由國家保護網路媒體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的合法權益：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負責全國網路媒體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的管理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網路媒體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的管理工作。由中央新聞單位、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新聞單位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屬新聞單位，對依法建立的新聞網站，經批准後可以從事登載新聞業務。其他新聞單位不單獨建立新聞網站，經批准可以在中央新聞單位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直屬新聞單位建立新聞網站或建立新聞網頁，從事登載新聞業務。

此項《暫行規定》之宗旨，在於把新聞網站納入管理系統，並給予其法規範圍內的新聞傳播合法地位。中共深知當今網路媒體、網路新聞的「無政府狀態」，其管理難上加難，故頒布《暫行規定》將未登記者納入管理範圍，是改變網路「無政府狀態」的退一步選擇。此外，《暫行規定》具體定有網路新聞傳播的「禁止事項」，規定：網路媒體站登載的新聞，不得含有不列9項內容：

- (一) 違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
- (二) 危害國家安全，洩漏國家秘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

---

<sup>148</sup>網易新聞中心網站。《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2004年。  
[http://news.163.com/2004w07/12619/2004w07\\_1090289740413.html](http://news.163.com/2004w07/12619/2004w07_1090289740413.html) (閱覽日期：2013.24)

- (三) 損害國家的榮譽和利益；
- (四)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
- (五) 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宣揚封建迷信；
- (六) 散布謠言，編造和傳播假新聞，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
- (七) 散布淫穢、色情、賭博、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
- (八) 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
- (九) 法律、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

除上述內容之外，《暫行規定》還特別強調指出，如果網路媒體網站鏈接境外新開網站、登載境外新聞媒體和網路媒體網站發布的新聞，必須另行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批准。其目的無非希望在法律形式上，維持住外國媒體在中國境內傳播新聞的准駁權。然而，由於網路傳播的不可控制性，此項控制權力在實質效力上，仍是大有疑問的。

#### 第四節 對臺文化安全之戰略管理

中共為防制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對於不管是臺獨、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主張之相關資訊傳播，都列入其「統戰」工作中必須加以通制的對象。故而，中共基本上已把對臺的「文化安全」戰略管理工作，視為是一種針對上述遏制對象，為指向的「政治宣傳」工作。而當今此等「政治宣傳」工作的內涵，可概分為對臺的「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三個方面。茲分述如下：

##### 壹、輿論戰

國家、政治集團、軍隊、社會機構和社會群體，透過控制、操縱、策劃、利

用各種輿論工具，對重大敏感問題進行導向性宣傳和評論的輿論對抗活動，可說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作戰模式。其作用往往超出政治對抗領域，滲透到各個層面。美國國防部將輿論戰界定為：有計畫的宣傳戰略，亦即是「一種有計畫的行動，向國外的閱聽者傳達有選擇的資訊或指標，用來影響其情感、動機、客觀的認同，最終影響外國政府、組織、團體或個人的行為。目的在強行勸導或強化外國態度與行為，來符合施行者的期待。」<sup>149</sup>

中共國防部則將其輿論宣傳戰，定義為：「對外國群眾有計畫的傳達選擇性情資和指令，以影響其情緒、動機（慾望）與外在言論，最後對其政府、軍隊與個人行為造成影響的一種作戰行為。」<sup>150</sup>吾人歸納中共解放軍相關研究部門的近期研究，認為輿論戰具有下列功能：

### 一、弘揚戰爭正義，爭取民眾支持

現代戰爭，打的是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如果不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不能最廣泛地動員和發動人民群眾，這場戰爭就難以取勝。人心向背從來都是取得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爭取人心問題上，交戰雙方無不通過輿論戰來贏得主動。<sup>151</sup>

### 二、醜化對手，陷敵於不仁不義之地

從近幾場高技術局部戰爭來看，利用網路、報紙電臺、電視等各種現代傳播手段，對敵方領導人、政權和軍隊進行鋪天蓋地的「醜化」、「妖魔化」、「欺騙敵方」宣傳，讓其失去民眾支持、失去人心。這在現代化戰爭中，已成為一種戰略戰術。<sup>152</sup>

### 三、激發己方鬥志，凝聚軍心民心

<sup>149</sup>郭洁敏。《論國際集體認同及其培育方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1年。

<sup>150</sup>許宏亮。〈論中國文化安全〉。《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2007年。

<sup>151</sup>羅峰。《當今的國際秩序》。廣州：南方出版社，2003年。

<sup>152</sup>蔡鵬。《試論亞洲區域合作機制的特點、趨勢與問題》。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在戰爭中製造、傳播、控制和及時發布鼓舞人心的戰地消息、樹立先進典型，介紹他們與敵人頑強戰鬥的精神，可激發己方的鬥志、增強士氣和凝聚力。因此在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中，通過傳播、控制和引導輿論，能夠生成一種無形的戰鬥力。<sup>153</sup>

#### 四、削弱敵方士氣，分化瓦解敵軍

利用敵方內部矛盾瓦解敵軍，歷來都是輿論戰的重要功能。現代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輿論戰瓦解敵軍的效能更加明顯，使美軍基本上達到不戰而勝的輿論戰目的。<sup>154</sup>

中共政權是「以黨領軍」之極權國家，以一條鞭方式掌握所有的媒體作為宣傳工具。中共在全球架構下推動對臺輿論戰，目的在於反獨促統，逼迫臺灣走向統一。中共對臺輿論戰場及於兩岸三地和國際之間。在國際上，中共有計畫地傾全力重建其國際形象，並矮化臺灣；在兩岸三地方面，除了全面掌控大陸傳媒，並在 1997 年後有效控制香港主要媒體，相括明報、南華早報、亞洲電視等。此外，亦善於利用臺灣駐北京記者傳播其所希望傳播之訊息；利用香港傳媒放假消息以打擊我方；善於製造議題對我形成壓力，以達成其輿論戰之目的。<sup>155</sup>

有關中共對臺輿論戰之策略與特色，茲分述如下：

##### 一、操控或利用港、臺及海外華文媒體，並拉攏國際媒體

臺灣電子媒體不僅自由開放，且具有很強的滲透力、強負載力及不錯的社會公信力等優勢。由於中共目前仍不允許臺灣媒體在大陸設辦事處，致使急速發展的臺灣電子媒體，因激烈的競爭，而對香港媒體的中國新聞相當重視，轉播率極

<sup>153</sup>郭洁敏。《論國際集體認同及其培育方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1 年。

<sup>154</sup>孫德剛。《準聯盟關係構建的原因初探》。福州：福建社會科學研究院，1996 年。

<sup>155</sup>長子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隱憂〉。《中共山西省省委黨校學報》，31(1)。2008 年，頁 82。

高。中共利用大陸及香港傳媒為傳聲筒，報導一些特定立場，不具名軍事專家的政治解讀，將中共官方觀點以隔空喊話的方式向臺傳播，經常有放影響到臺灣內部的輿論，並傷害我國的政策與民意。<sup>156</sup>

其次是，利用國際媒體希望進軍大陸市場的心態，進行節目互惠交流並開放國際通路，造成國際媒體之自我設限，或採用較不利之對臺報導。

## 二、發布不實或誇大的訊息，打擊臺灣民心士氣

時常以軍演為工具，發布不實或誇大的軍演訊息，造成臺灣股市動盪、人心不安，企圖藉此威懾臺灣人民，同時牽制美國對臺軍售。有時透過「網軍」散佈不實或誇大的訊息，並試圖癱瘓我軍事設施及政府網站等資訊運作，希望以「軟打擊」方式攫取武力戰無法取得的軍事利益。此外，也企圖擴大臺灣內部矛盾，煽動臺灣輿論及社會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尤其著力於詆毀陳前總統的信譽，減損其執政能力，製造可乘之機。

## 三、在國際上取得對臺議題之發言權，混淆國際視聽

為使臺灣在國際上「消音」不斷以高分貝，再三宣示中國「反對臺獨，絕不妥協」的言論，並迂迴運用香港、日本、美國及其他國際媒體，散播訊息，強調中國「武力是用來對付臺獨，而不是臺灣人民」爭取軍事行動的正當性，並抑制美圍的介入。《反分裂國家法》之制定，顯示中共在兩岸問題操作上已採取主動，企圖透過法律戰混淆國際輿論，亦為中共在國際上取得對臺議題發言權，進而為犯臺建立法理基礎。其次，加強推銷「一國兩制」以港澳模式矮化臺灣為地方政府，讓國際社會接受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再加上以抹黑的惡劣手法，指控臺灣是兩岸緊張情勢的麻煩製造者，影響國際社會對臺支持。<sup>157</sup>

<sup>156</sup>長子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隱憂〉。《中共山西省省委黨校學報》，31(1)。2008年，頁82。

<sup>157</sup>張健榮。《八國峰會與俄羅斯能源外交》。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年。

總體而言，中共近年一再強調，輿論戰有其獨立作戰的功能與角色。未來中共對臺作戰的形式，有可能僅以輿論戰或「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的簡單形式，達成作戰的目標。但也不能排除其軍事行動同步展開的可能，這一點，必須以整體情勢與條件作判斷。<sup>158</sup>

## 貳、心理戰

心理戰是一種無聲無息、塑造氛圍的戰爭，它以敵人的心理為對象，以訊息為武器，以宣傳為手段，以瓦解敵人的抵抗意志為目標。廣義而言，心理戰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綜合運用政治、經濟、社會及軍事等領域訊息及指標的傳遞，影響敵方內部的情感、動機、態度與思維，最終影響敵方政府、組織、團體及個人的行為。而心理戰的目標，就是藉由上述來導引或增強敵方的態度和行為，使其有利於發動者目標之實現。<sup>159</sup>

心理戰是人類戰爭文明化的呈現，它可以避免原本可能出現的武力衝突，或讓衝突儘快結束，以減少雙方人員的傷亡。傑出的心理戰能夠影響敵人的思維，改變其對雙方既存矛盾事物的立場，因而不會萌生訴諸武力解決衝突的想法，甚至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政略層級操作成功的心理戰，能夠改變潛在敵人對雙方關係性質的認知，進而放棄敵對態度化敵為友。過去十年來，中共對臺威懾心理戰手段眾多，從臺海試射導彈、共軍舉行兩棲登陸演習、到打壓綠色臺商、警告臺獨勢力等，不一而足。<sup>160</sup>其種類主要如下：

### 一、軍事威懾

1995年6月9日李登輝總統在康乃爾大學校友會中，發表「民之所欲，長在

<sup>158</sup>羅峰。《當今的國際秩序》。廣州：南方出版社，2003年。

<sup>159</sup>王岳川。〈新世紀文化的創新與大國形象確立〉。《杭州師範學院學報》，(6)。2007年。

<sup>160</sup>李曉華。〈中國和平發展的文化安全思考〉。《廈門特區黨校學報》，(99)。2008年。

我心」的演說。中共譴責李總統在康乃爾的演說，為「私人」、「非官方」訪問範圍的外交演說，並開始對臺灣展開一連串「文攻武嚇」行動。同時，也對美國提出強烈的警告。而中共「文攻武嚇」之主要心戰意圖如下：<sup>161</sup>

(一) 在外交關係心理戰效果上，透過兩岸關係動盪與不安情境的營造，企圖對美國政府形塑李前總統是兩岸關係「麻煩製造者」的形象，藉以改變美國政府對我政府堅定支持的立場。

(二) 在政治、經濟、社會及心理上，則期望透過「文攻武嚇」的策略運用，營造兩岸關係緊張的氣氛，造成國人心理的恐慌，進而影響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以求徹底瓦解國人的心理防線。

## 二、政治威攝

中共在 1995 年 7 月到 1996 年 3 月期間，前後共發表了 7 篇評論李登輝先生的文章，其中前四篇是由《人民日報》及《新華社》評論員聯合發表。該七篇文章分別集中在兩個時間點發表。首先，一評到四評，主要是因應、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並在該校發表了公開的演講，隨後中共便進行軍事演習，發表四評的文章。五評到七評，則是集中在中華民國第九屆總統副總統選舉之前，也是配合軍事演習，期盼影響當年的選舉。這七篇評論李登輝先生的文章並非都是單獨進行，而是搭配軍事（飛彈）演習而來，意圖使威脅恫嚇的陰影再現。<sup>162</sup>

## 三、經濟威攝

2000 年 4 月 8 日，中共中央臺辦、國臺辦副主任李炳才稱，純不允許個別臺灣工商界領袖一方面在島內公開支持「臺獨」，另一方面又在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活動中撈取好處。自從民進黨贏得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北京官員和臺灣問題

<sup>161</sup>李春霞。〈我國國家文化安全面臨的威脅和保障措施〉。《南陽師範學院學報》，6（10）。2007 年。

<sup>162</sup>楊曉麗。〈跨文化傳播中的本土文化安全淺析〉。《法治與社會》，（2）。2008 年。

學者，即開始將矛頭指向了支持民進黨的臺商。中共之所以要做如此的政治宣示，其主要目的應有下列幾項：<sup>163</sup>

- (一) 藉限制支持或同情臺獨的臺商之經商活動，警告臺商不得支持臺獨。
- (二) 以「以商逼政」之策略，來影響臺灣民眾與商界對新政府之支持與向心。
- (三) 宣示中共為了達到「統一」的目的，不惜犧牲兩岸經貿往來之決心。

近年來，中共對我實施心理戰，也展現十足的靈活度。從十年前開始的文攻武嚇，到 2007 年後的開放臺灣水果登陸等，手段愈趨多樣，其心理戰的目標卻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解除臺灣民眾的心防，以便在兩岸的競爭對抗中，瓦解臺灣的民心士氣，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sup>164</sup>

至於政略層級的心理戰，則非軍方能夠獨立完成，而是需要由政府不同部門各自在其政策範疇內執行相關措施才能克竟全功。就軍方本身而言，這是將國軍對心理戰的定位，從戰術層級提升到戰略層級的有效方式。美伊戰爭已清楚呈現戰術層級的軍事行動，是為了實現戰略層級的心理戰目標。

## 參、法律戰

### 一、法律戰的意義

法律戰具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指字義上的法律戰，一指軍事上的法律戰。字義上的法律戰係指以法律為工具，經過法院訴訟來決定勝負的行為。軍事上的法律戰則指以法律為武器，透過各種手段以爭取軍事勝利的作戰方式，簡而言之，就是「以法制敵」。2001 年發生「九一一」恐怖事件後，不但改變了傳統國家安全的觀念，反恐怖戰爭也出現一個國家與恐怖組織所處在國家之間的新戰爭

<sup>163</sup> 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6)。2007 年，頁 53。

<sup>164</sup> 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4)。2007 年。

形式，致使國際法上關於使用武力的規則，產生新的問題。<sup>165</sup>

以「反恐」為名，對他國採取軍事打擊或占領的第二個例子，發生在 2003 年，美國以伊拉克與恐怖主義有所關聯，以「預防性自衛權」為名，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就此，在論斷戰爭是否「合法性」方面，美伊兩國展開一場針鋒相對的法律戰。在戰前，美國四處遊說，指稱伊拉克違反聯合國「1441 號決議」並積極搜尋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力求得到聯合國的「合理授權」。伊拉克則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譴責美國攻打伊拉克違反聯合國憲章，並要求安理會就此展開辯論。在戰爭期間，雙方更透過外交戰、輿論戰與心理戰融入法律戰，揭露對方不法行為，奪取法理優勢，以爭取國際政治和道義支持，而展開「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法律對抗。<sup>166</sup>

以上二例充分說明法律戰已成為 21 世紀贏得戰爭最大利益不可或缺的手段。

## 二、中共對臺法律戰的歷程與內涵

長期以來，中共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以及臺灣之地位，始終提不出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雖然中共當局基於對臺工作的策略需要，會與時俱進地彈性調整「一個中國」的定義，可是，每當臺灣主體意識提升或兩岸發生重大爭執，中共總得不厭其煩地要求邦交國再次確認其支持「一個中國」的承諾。美國雖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美國與中共在認知上卻有所不同。至於臺灣內部對「一個中國」更有不同的看法，民進黨政府認為「一個中國」是議題、選項，國民黨認為「一個中國」是願景，即均不願承認中共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可是對中華民國而言，深化民主化與臺灣問題「國際化」，則有助於國際社會的關心與介入，才有助於臺海安全和平之維繫。<sup>167</sup>

1958 年臺海危機發生後，中共為了強化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概念，自建政

<sup>165</sup>謝紅菊。〈我國文化安全問題的主要矛盾〉。《工業論壇》，13（2）。2007 年。

<sup>166</sup>姜敏、馬瑞清。〈中國文化安全中的主要矛盾及應對策略〉。《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3（4）。2007 年，頁 135-136。

<sup>167</sup>解學芳。〈一九九九年以來我國文化安全研究述評〉。《江南社會學院學報》，9（3）。2007 年。

以來即不斷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不容外國勢力的干涉的立場，不斷透過史實、國際條約、協議、國際法、領海和領空等方面進行系統化的研究，以充分說明臺灣及其外島是中國大陸固有的領土，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分離出去。其主要包括：

(一) 宣布領海範圍，制止美軍入侵。在臺海戰役前，中共還沒有劃定領海範圍，為了取得抗美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中共於 1958 年 9 月 4 日發表「關於領海的聲明」，宣布領海寬度第十二海浬，強調「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艦，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許可，不得進入中國的領海和領海上空」。

(二) 對外宣示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突顯美國介入臺海戰役的不合法性。周恩來在 1958 年 9 月 6 日發表「關於臺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申明臺灣和澎湖是中國大陸的領土。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是中國大陸的內海島嶼，中國大陸有權採取一切適當的方法，在適當的時候，解放這些自己的領土，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許任何外國干涉。

(三) 強調一個中國，離間臺灣與美國的關係。中共分別於 1958 年 10 月 6 日、25 日，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除肯定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外，還強調美國對臺灣具有野心，一是將台灣視為「軍事上存在的政治單位」，二是託管臺灣。希望臺灣不要屈服於美國人的壓力。同時宣布對四種軍事目標（金門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實行隔日炮擊的做法，來套住美國，並使我政府能長期固守金馬地區。<sup>168</sup>

此後，中共仍不斷對臺進行法律戰，企圖從平時在國際間建立擁有臺灣主權的認知，到非和平時期轉化為對臺採取非和平手段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中共企圖以法律戰影響未來兩岸衝突究竟是國際戰爭或內戰、國際干預正當性、武裝衝突

<sup>168</sup> 甘子成、郭風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國家文化安全視角〉。《天府心論》，6（10）。2007 年。

規範適用等問題的性質，也企圖影響中共對臺採取戰爭以外的非和平手段所涉的相關法律問題的性質。<sup>169</sup>

中共法律戰的作戰體系架構，主要包括法理研究、法規訂定、機制設立、法規執行與裁判、相關法律人才培養、作戰或其它非和平手段法律預案擬訂與演練、宣傳論述研擬及外部操作等層面。從中共法律戰涉及層面觀察，中共對臺推動法律戰絕不限於戰時，而是平戰結合，且平時可能較戰時更為重要。中共法律戰也絕不限於軍事部門，而是軍文協作，在平時文職部門的重要性可能更高。



---

<sup>169</sup>李金齊。〈文化安全釋義〉。《思想戰線》，33（3）。2007年。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壹、大陸文化發展的抉擇

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所發起的「破四舊、立四新」，不但造成對傳統文物的巨大破壞、教育體系的全面中斷、更使得教育研究發展留下一大段空白。其後發動「批林（標）批孔（子）」、「批孔（子）揚秦（始皇）」，更被稱為「二次文革」。總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大陸文化已「氣若游絲」。中國文化、文物的大破壞、學術思想界的真空狀態可謂空前。此一空窗期，正好由「海外歸國學人」（海歸派）填補，在改革開放期間，主張「全盤西化」的「河殤派」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都是在此情境下開展的。中共當局對「全盤西化派」的戒心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後，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開放」路線，成功的恢復經濟生產力，挽救了瀕臨崩潰的社經制度，這條修正主義路線，在1990年代衝破「姓公與姓私」與「姓資與姓社」的爭議，並隨著中共與國際社會接軌後，至今已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官方意識形態），不可逆轉，中共建政後的路線之爭，至此亦已終結，理想主義的革命性的意識型態觀」（教條主義）成為歷史的塵埃。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中共雖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張，為其實踐綱領，但基本上其路線是向右修正，這樣的修正也使其「一黨專政」統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雖依靠「強力的鎮壓」與「民族主義訴求」穩固其統治權威，但基本上經濟向右，政治向左的矛盾，仍是未來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且隨著經濟的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的擴大、官員貪污腐敗的與東西發展失衡等種種的問題，如無有效處理，都會威脅其統治地位。而改革開放後，讓一度消失的民間公共論域，重新復起於社會，這股民間力量有何發展與對其公民社會的建構有其影響，以及其與中共政權維持何種關係，對中國大陸的文化變遷產生何種影響，則值得後續的觀察

與期待。

## 貳、建立自主思維的主體性

中國想提高自己的國家文化軟實力，前提需要建設中國思維的主體性。失去了這個主體性，思維一旦被美國化或者歐洲化，中國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當然也就無所謂擁有國家文化軟實力。思維的主體性建構及其成熟性程度，是衡量一個大國是否真正擁有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誌。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超越西方的文化經驗確立中國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思想體系就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因為正是這種思維的主體性才是確定存在的主體性的唯一標準。而正是這樣的標準，才能夠把你和別人相區別，你才能具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你的存在就只是別人存在的一種延伸和方式而已。

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與外銷中華文化這個偉大目標的實現，一個最具戰略性意義的任務，就是要建設這樣的文化主體性。由於這種文化的主體性是只有建築在思維的主體性上才能完成的一項革命，因此，完成這項革命是實現文化主體性建設的根本性前提。同時，還由於這種思維的主體性具有建構人的心理結構的重要意義，而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又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個民族的顯著標誌，一切文化的生存都是它的外在表現形態，因此，建設中國思維的主體性，不只要實現中國精英階層思維主體性建構，更為重要和更為關鍵的是整個國家和民族、民眾思維的主體性建構。只有這樣的主體性建構，才能夠完成和實現在國家戰略競爭層面上的文化軟實力的提高。一個國家必須要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作為支撐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如果僅僅把外國的東西拿來，而沒有自己的價值標準，那麼，要想保持社會文化穩定健康的發展和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是難以想像的。

## 參、文化軟實力的具體展現

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戰略競爭能力，它是一種與其他國家的文化戰略競爭過程中相比較而存在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是通過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的整體性力量表現出來的，而不僅僅是它的文化代表性人物，儘管沒有這樣的文化代表性人物無以集中體現這個國家文化軟實力所達到的一個高度。因此，

重建「民眾」在建構國家文化軟實力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確立「文化民權」在這其中的戰略基礎性地位，應當成為提高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價值取向。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良好的文化環境，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不但是中國步入全球化發展時代的緊迫任務，更是落實以人為本、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保障，中國只有自覺建構文化軟實力，才能確保未來改革的方向，才能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加的文化需求，才能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重要保證，其具體展現在：

### 一、中國步入全球化發展時代的基礎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進程中，伴隨著國家硬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也得到了全面迅速的提升，實現了從被動到主動、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積極發展。但同樣看到，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才剛剛起步，與發達國家之間仍有著相當大的差距，軟硬實力發展水準的不平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漸顯現，國際國內社會對中國軟實力的現狀和未來也有著很多憂慮。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後，文化貿易和經濟活動要遵守國際準則，對外開放的程度大大增加，無論是在國際文化市場，還是在國內文化市場，都面臨一個和國外資本同台競爭的問題，如果不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建構文化軟實力，不僅中國自己的文化產品輸出有問題，影響力受到限制，而且還會被別人佔領本土市場，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文化安全。

### 二、落實以人為本、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保障

發展先進的文化生產力，建構文化軟實力，其根本目的還是在於服務於人，服務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根本需要。人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人也是最活躍的生產力要素，怎樣對待人，是國家軟實力與國家形象的根本之所在。以人為本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主要的治國方略之一，「今天要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品質，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sup>170</sup>以人為本就是堅持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使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普遍認同感

<sup>170</sup>胡錦濤。〈美國耶魯大學演講全文〉。《人民日報》，2006年4月2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4322655.html>（閱覽日期：2013.4.22）

和滿意感，從而達到思想上的協調統一，最大規模地將人心凝聚起來，進而推動和諧社會積極構建。在全面生產中，其最終目的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佔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sup>171</sup>在這個過程中，離不開文化的積極作用。通過建構中國文化軟實力重視人、尊重人、培養人，以人為主體，有利於真正貫徹以人為本的政策方針。

### 三、確保未來中國改革的方向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快速發展，GDP 總量位列世界前茅，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飛速。惟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較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很大距離，不僅複合型人才短缺，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效率更是不高。而目前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收入分配不公，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經濟。在這改革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建立起先進文化、和諧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確立社會發展的方向，解決深層次問題，抵禦外來文化的腐蝕。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一種好的文化、制度和價值體系必然成為經濟發展是否能向良性方向發展下去的深層的、決定性因素，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方向。<sup>172</sup>在這個階段，文化的方向就會主導改革的方向，成為決定改革能否向良性方向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 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中國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一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發展的社會，一個以人為本、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而現行文化狀況無法適應這個要求，無法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自我實現的需要是最高等級的需要。也就是說，在滿足基本的物質層次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個體的全面發展。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人的更高級需求便會優先增長，而文化產品與文化消費則會優先增長。目前，中國城鄉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費支出在快速上升，並呈現出多樣性、自主選擇性的特徵，而文化狀況與城鄉居民的文化需求嚴重不符，

<sup>171</sup>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1979 年，頁 123。

<sup>172</sup>顧江主編：《文化軟實力與產業競爭力》。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4。

文化發展中的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中國公共文化設施不足已嚴重制約了公眾休閒生活品質的提高。

## 五、和平崛起的重要保證

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代的主題，發展文化軟實力是張揚國家吸引力，贏得世界的認可和尊重的重要途徑。美國超級大國的定位不僅來源於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更來源於其文化的吸引力。在這個多極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不僅要有硬實力的支撐，還必須具有文化上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發展文化軟實力不僅能為國家軟實力建設奠定基礎，也為國家硬實力的增強提供精神動力和思想支撐；它不僅事關一個民族的國際形象，更是中華文明屹立於世界文明之林的重要保障。

文化軟實力是凝聚民族力量、促進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國家的發展和強盛，社會的安定與團結，民族的自強和復興，人民的安居和利益，都離不開先進文化的支撐與推動。文化是立國之根本，尤其是在這個文化價值衝突日益加劇的環境中，文化決定了一個民族精神家園的前進方向，正是中華文化構築了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發展文化軟實力才能重塑中國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核心標誌之一，沒有文化軟實力這個要素的作用，一個國家不可能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展開順暢積極的活動，也產生不了巨大的影響力，承擔不了一個大國應有的責任和義務，從而難以發揮相應的作用和價值。

從安全性上講，越是強勢的文化就越具有文化安全性，因為它不僅對其他文化具有侵蝕性和吸引力，對自身也擁有強大的自信力和底定心。反之，越是弱勢的文化，其安全係數越低，也越容易被其他文化覆蓋。一個國家的和平崛起，如果沒有強大文化的屏障，是難以想像的，沒有安全係數高的文化，和平崛起就沒有了保障和持續的原動力。縱觀當今世界文化安全形勢，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狀態往往是和一個國家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大小成正相關係的，而這種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大小，又是與這個國家提供給世界文化產品的能力相一致

的。<sup>173</sup>文化關乎主權，文化安全問題就是一個國家精神家園的安全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硬實力有了相當的提升，軟實力也有了相應的增加。在目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發展階段中，文化軟實力正是凝聚民族力量度過關鍵時期的強大動力，建構文化軟實力對於國家的發展具有非凡的時代意義，這不僅是擴大文化影響力的問題，也是硬實力發展的方向和動力問題。

##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 壹、大陸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思維

近年來，大陸不斷提出要讓文化「走出去」，2011年年初出爐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也一再強調「要傳承優秀民族文化，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主題為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等問題。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來，中共首次將「文化命題」作為中央全會的議題；也是繼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討論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問題之後，中共決策層再一次集中探討文化課題，其戰略部署和政治意義不言可喻。<sup>174</sup>

爾來中共中央重申舊論，其實是近年思維的一貫延續。從戰略角度來看，大陸認為本身文化競爭實力與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經濟實力極不相稱，也有必要鄭重其事的聚焦討論，依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的看法，主要是因「三個不適應」的問題，包括文化水準和綜合國力不適應、文化發展和經濟增長不適應、文化發展和國民素質要求不適應。大陸上胡錦濤主持下的六中全會，將文化建設視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層面

另據大陸資料顯示，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美國佔43%，歐盟佔34%，亞太地區佔19%，其中日本佔10%，澳大利亞佔5%，其餘4%才屬於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其他亞太地區國家；因此，中國有必要大力實施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此外，中國認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調整時期，世界多元化、經濟全球化已然成形，各種

<sup>173</sup>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45。

<sup>174</sup>人民網甘肅頻道。<http://gs.people.com.cn/BIG5/183345/15775758.html>（閱覽日期：2013.4.28）

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明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及文化國際影響力，是一種「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務。

「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可從內外兩個層面來看：對內方面，就是進一步鞏固由共產黨領導的文化建設工作，因此，加強新聞輿論導向工作，壯大主流輿論，以及強化網路思想文化陣地建設，此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工作的重點之一。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確保文化主旋律的持續發展，不受外來文化勢力及內部異議言論的干擾，進而影響共產黨執政地位，以及向來至為重視的文化宣傳工作。

對外方面，主要是開展多管道多形式多層次的對外文化交流，創新對外宣傳方式方法，增強國際話語權，進而達到文化輸出的目的。大陸文化部部長蔡武曾表示：「中華文化走出去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只有政府交流性質的是不夠的。我們的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多的利用商業的管道、利用市場化的運作來推行。」

總體而言，大陸係將對外文化輸出視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乃至構建整體國家安全防護網的一環，一方面以文化「軟實力」包裝傳統政經「硬實力」，避免各國反彈；一方面營造「富而好禮」的溫和形象，以文化的柔性力量潛移默化，降低「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 貳、大陸文化「走出去」面臨的困境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主要文明在各自封閉發展了數千年之後開始走向交流、碰撞、衝突和融合。文化開始成為人們相互識別的標誌和標準，「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於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區、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面上認同于文明。」文化成為凝聚人也是隔離人的重要工具和載體，文化也成為當今世界產生衝突的主要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間的衝突顯然不能被忽視。不同文明有著各自的信仰、價值觀、習俗習慣，這些都將在此文明圈裡的人與外面的隔離開，形成一種特有的標識。而在圈裡的人，自覺不自覺地就會產生對自我文化的保護意識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感，這就造成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困境：不同文化在本質上的隔膜、自我保護意識和潛在的衝突使得人們對外來文化天生存在敵對情緒，文化的分裂力量同統一力量一樣，都具有強大而無形的影響力。

同時，文化產生的不同地域也造就了文化間的差異，這種差異是天生存在的，形成文化交流中的壁壘和障礙。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文明之間因其產生的土壤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特點，比如中華文化生態由半封閉的大河大陸型生態環境萌生，而西歐文化源自開放的海洋型環境。這兩種文明之間存在眾多差異，人們的價值觀取向、行為方式可能會在交往中不斷碰撞，需要磨合才能更好地推進交流。

不同民族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民族之間的交往既是人口與商品的交流，又是文化和觀念的交流。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和資本主義文明的興起，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也越來越多。到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隨著中國走向改革開放，在外國文化和科學技術等進入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也開始敞開國門走向世界。並且，隨著中國成為經濟大國，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塑造好中國形象，便成為當今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重要議題。中國大陸也把中國文化的輸出作為文化工作的重點之一。

中國在推動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體認到中國文化和藝術大量走向世界，並不意味著影響力的上升。例如目前幾乎很少有中國的原創產品，包括文化產品，成為西方人的主流消費品，很多國外民眾對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甚至還停留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刻板印象。

另一個問題是，大陸目前「走出去」的文化品類，仍以傳統文化為主，以致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只記得京劇、中國結、舞龍舞獅、氣功武術等傳統的象徵性符號，對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與文化面貌仍存在偏見和誤解。因此，普遍要求「讓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當代的中國，一個發展中的中國」的呼聲四起。

然而，由於大陸文化產業競爭力不強，因此，中共推動文化「走出去」仍面臨一些挑戰，主要包括幾個面向：

## 一、文化實力不足

大陸雖然是一個文明古國和文化資源大國，但還不是一個文化傳播強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還處於相對劣勢，例如文化企業實力不強、文化產品競爭力不夠，以致對外文化貿易逆差嚴重，以及對外貿易範圍不夠廣泛、結構不盡合理等等，都是造成中國文化國際競爭力不足。

## 二、文化貿易地位落後其他發達國家

大陸已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國際上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的影響力明顯有落差，其原因包括缺乏知名民族文化品牌、文化輸出政府色彩過濃、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數量和品質還不符合國際需求，導致「文化入超」與「經濟出超」形成對比。

## 三、未善用文化資源大國地位

大陸並未充分利用豐富的文化資源寶庫，從歷史文化大國向文化產業強國和文化旅遊大國轉變。同時，雖然具有中國元素的文化產品已被許多國家開發，但這國際文化競爭環境中，反而會造成文化資源流失的危機，且對中國文化產業造成競爭。

## 四、西方／國際文化競爭的挑戰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透過「薯片」（麥當勞）、「晶片」（電腦）和「大片」（電影）影響中國文化，目前中華文化正處在走向世界初階段，大陸文化面臨「文化霸權主義」、「資訊殖民主義」、「網路文化殖民」及「數位鴻溝」等的挑戰，以美國為主的先進國家，在輸出文化產品取得高額利潤的同時，也輸出其政治觀念和文化觀，這不但會衝擊大陸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還會致使大陸在國際間成為「文化弱勢」。

## 五、人才缺乏

當前大陸在人才方面，不論是從質或量都還很缺乏，特別是缺乏具國際市場眼光的經紀人和操盤手、可將民族文化資源變為民族文化產品、品牌和名牌的創意者、生產者和資源整合者。

總的來說，中共以「兩條腿」（國家／文化事業、市場／文化產業）作為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一方面以文化交流的形式擴大大陸的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則透過市場化機制讓更多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增加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共來說，推動文化「走出去」雖然還只是在初步階段，但「經濟『走出去』，必然導致文化『走出去』，而文化『走出去』又是經濟『走出去』的最高

形式」，<sup>175</sup>隨著大陸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共推動文化「走出去」將必更為積極，以此超越西方學者所謂的「全球性的在地生產」的層次，繼而進入全球化文化話語爭奪的場域。

## 參、結語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七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並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擔負起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政治責任，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域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畫」。這是繼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討論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問題後，中共高層再一次集中探討文化課題。<sup>176</sup>

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個面向中，中共中央選擇比較沒有急迫性的文化體制改革，作為「十七大」的「收官之作」（「十八大」新舊交替之前最後一次重要集會），主要係因文化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那麼敏感，沒有經濟體制改革那麼沉重，沒有社會體制改革那麼複雜。簡言之，中共高層雖思考進行政改，但無從下手，而文化離不開政治，文化體制改革終究會碰到政治，故採取由文化、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包圍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先易後難，震盪較少。無論如何，推行文化體制改革在大陸政經走向「後改革開放時代」，已被中共中央視為維持社會穩定和諧的重要法寶。另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文化體制改革作為核心訴求的正式檔中，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也列為重要的一環，為下一波凸顯綜合國力的主要手段。

大陸在成為經濟大國之後，雖想接著以文化大國的姿態走向世界舞臺，也企盼「讓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當代的中國，一個發展中的中國」，但如果文化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只是為了「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甚至只是為了確保

---

<sup>175</sup>國際經濟合作月刊（北京），第1期。2011年，頁10。

<sup>176</sup>中共推動文化體制改革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2年「十六大」至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前，這是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發展階段；第二階段為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到2007年十七大召開，這是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理論化、系統化階段；第三階段為2007年十七大迄今，主要是文化體制改革思想深化階段。相關內容參見「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脈絡」（2011年10月17日）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7/c\\_1221678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7/c_122167832.htm)（閱覽日期：2013.3.6）

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縱有深厚的千年文化底蘊，縱有不斷成長的文化輸出產值，仍會繼續侷限當代文化創作的能量與潛力。儘管在文化安全問題上，大部分國家都表現出很強的認知敏感，也竭盡所能採取行動，但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效果如何？

在殘酷的國家間文化競爭場域中，弱國所擁有的弱勢文化面臨著嚴峻的被侵蝕、同化，或以積極的表達，就是「被融合」的境遇，如果沒有宗教或其他更強的維繫力量，世俗社會面臨強勢文化的滲透難有抗擊之力，最後甚至可能淪為「民俗」納入文化人類學學者的視線。因為不存在一個超國家的世界政府來說明其保持文化特徵，控制強國的文化入侵，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既沒有干涉國家主權的許可權，又沒有大規模實施文化保護的能力。

最響亮的文化安全呼聲來自於大國，文化安全的競爭就是大國間的安全競爭。在相互猜疑、人人自危的國際社會，國家出於維護自身文化安全的行為即使並非意在進攻，在其他國家看來，文化安全行為的目的也是「模糊的」，很難與文化擴張完全割裂，由此便會使其他國家感受到「威脅」，引起安全感的降低，進而以敵對情緒掀起新一輪的文化反擊。這種以維護安全為起點的行為最終能否收穫一個更加安全的生存環境，這就是「安全困境」給我們提出的難題。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以尋找「假想敵」的思維模式，預言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都將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產生劇烈的衝突。在他的書出版之後，伊斯蘭文化對基督教文化的挑戰已經被「檢驗」，接下來，西方的「先知先覺」們開始警惕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稱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滲透的「特洛伊木馬」，<sup>177</sup>這正是亨廷頓式的思維模式。雖然約瑟夫·奈在多年前就發出警告：「如果你把中國視為威脅，它就會變成威脅。」<sup>178</sup>但這一自我實現的預言並不能阻止西方的安全防範甚至安全進攻。因為從認知和行為的雙重困境解讀，中國維護文化安全的行為正在「被認為是」進攻性的文化擴張，這一點是否需要被納入中國文化軟實力戰略的思考範圍？

所幸的是，文化安全的競爭不像核武器競賽般如箭在弦上，也不像領土爭奪般是零和遊戲，畢竟，文化競爭包含著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過程，要複雜和長

<sup>177</sup>Confucius Institute Report, <http://zsr.info/news/images/stories/usconfuciusinstitutereport.pdf>.

<sup>178</sup>轉引自王義桅。《美國外交行為的極好注腳，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評介》。《博覽群書》，第5期。2003年。

久的多，而各國維護文化安全的終極目標，也希望都能走向如費孝通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和諧境界。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 Adrien Hastings 著，哈遠新譯。《基督宗教簡明史》。台北：啟示出版社，2006年。
- Praseniit Duara 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 人民出版社。《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子杉。《國家的選擇與安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 王佐書。《中國文化戰略與安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Praseniit Duara 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 中央文獻出版社。《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 朱炳元編。《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
- 列寧。《國家與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宋國誠。《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一公元1990-2020》。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
- 胡鍵。《中國軟實力：要素、資源、能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
- 胡惠林。《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 胡惠林。《文化政策學》。太原：書海出版社，2006年。
- 門洪華。《建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 洪兵。《國家利益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
- 周鋒澤。《媒體產業制度論——周鋒澤自選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2004年。

- 孫德剛。《準聯盟關係構建的原因初探》。福州：福建社會科學研究院，1996年。
- 郭潔敏。《論國際集體認同及其培育方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1年。
- 張玉國。《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當代文化產業論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張建華編。《中國面臨的緊要問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8年。
- 張健榮。《八國峰會與俄羅斯能源外交》。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年。
- 陳定家編。《全球化與身份危機》。開封：河南大學，2004年。
- 廖永亮。《輿論調控學：引導輿論與輿論引導的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
- 梁守德主編。《新形勢與新國際觀》。北京：中央編譯，2004年。
- 俞可平編。《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年。
- 俞思念。《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文化創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潘兆民。《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
- 潘一禾。《文化安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翁明賢。《突圍：國家安全的新視野》。台北：時英出版社，2001年。
- 顧江主編：《文化軟實力與產業競爭力》，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劉先春。《中國共產黨執政資源研究》。北京：高等教育，2008年。
- 劉杰。《中國軟實力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年。
- 羅峰。《當今的國際秩序》。廣州：南方出版社，2003年。
- 蔡鵬。《試論亞洲區域合作機制的特點、趨勢與問題》。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樂後聖。《國家和平發展戰略》。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
-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中文期刊

- 于炳貴、郝良華。〈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哲學研究》，第7期。2002年。
- 王岳川。〈新世紀文化的創新與大國形象確立〉。《杭州師範學院學報》，(6)，2007年。
- 王書道。〈現代文化傳播與我國文化安全〉。《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2005年。
- 甘子成、郭風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國家文化安全視角〉。《天府心論》，6(10)。2007年。
- 羊城晚報。〈胡錦濤強調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文化建設，確保國家文化安全社會穩定〉。《羊城晚報》。2003年8月13日。
- 國際經濟合作月刊(北京)，第1期。2011年。
- 宋效峰。〈文化全球化與中國的文化安全〉。《探索》，(5)。2005年，頁23-25。
- 李宗桂。〈文化創新與民族精神的培育〉。《南方日報》。2002年。
- 李金齊。〈文化安全釋義〉。《思想戰線》，33(3)。2007年。
- 李天明、周暉、楊中華、關玉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國文化安全策略研究〉。《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6)。2007年，頁1-6。
- 李春霞。〈我國國家文化安全面臨的威脅和保障措施〉。《南陽師範學院學報》，6(10)。2007年。
- 李曉華。〈中國和平發展的文化安全思考〉。《廈門特區黨校學報》，(99)。2008年。
- 李春霞。〈我國國家文化安全面臨的威脅和保障措施〉。《南陽師範學院學報》，(4)。2007年。
- 林宏宇。〈文化安全：國家安全的深層主題〉。《國家安全通訊》，(3)。1999年。
- 欣榮。〈建立文化安全體系捍衛我國的文化安全〉。《國家安全通訊》，(3)。2002年，頁16-18。
- 長子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領域面臨的隱憂〉。《中共山西省省委黨校學報》，31(1)。2008年。
- 胡惠林。〈文化民權：國家文化軟實力建構的戰略基礎和價值取向〉。《探索與爭鳴》，第10期。2010年。
- 周曉陽、張多來。〈論中國傳統文化是江澤民思想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船山

- 學刊》，(3)。2004年。
- 夏蕾。〈中國文化安全問題研究〉。《法制與社會》，(7)。2007年。
- 紀少峰。〈論中國共產黨四代領導人的國家文化安全思想〉。《科學論叢人文科學》，(4)。2007年。
- 姜敏、馬瑞清。〈中國文化安全中的主要矛盾及應對策略〉。《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3(4)。2007年，頁135-136。
- 祈述欲。〈國際文化競爭力與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國家行政學院學報》，(5)。2001年。
- 姚冬梅。〈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文化安全問題〉。《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2(5)。2008年。
- 許宏亮。〈論中國文化安全〉。《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2007年。
- 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4)。2007年。
- 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6)。2007年。
- 葉金寶。〈文化安全及其實現途徑〉。《戰術研究》，(8)。2008年，頁11-18。
- 侯貴文、栗志剛。〈文化軟實力研究述評〉。《理論月刊》，(9)。2008年。
- 楊曉麗。〈跨文化傳播中的本土文化安全淺析〉。《法治與社會》，(2)。2008年。
- 師英傑。〈論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構原則〉。《湖北大學學報》，38(1)。2011年。
- 張殿軍，鄭興剛。〈對外文化交流: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3)。
- 湯萬文。〈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國文化安全〉。《理論與現代化》，(2)。2007年。
- 俞曉秋。〈非傳統安全論析〉。《現代國際關係》，(5)。2003年。
- 潘一禾。〈「非傳統」視野中的當代國家文化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2)。2005年。
- 解學芳。〈一個全心的學術研究領域:國家文化安全〉。《高校社科動態》，(2)。2007年。
- 解學芳。〈一九九九年以來我國文化安全研究述評〉。《江南社會學院學報》，9(3)。2007年。
- 嚴興文。〈試論國家文化安全的內涵、特點和作用〉。《韶關學院學報》，28(2)。

2007 年，頁 138-141。

謝紅菊。〈我國文化安全問題的主要矛盾〉。《工業論壇》。13（2）。2007 年。

轉引自王義桅《美國外交行為的極好注腳，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評介》，  
《博覽群書》，第 5 期。2003 年。

## 碩博士論文

陳筑君。《中國的文化安全問題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鄭國智。《中共對臺統戰策略之研究：公元 2000~2002 年》。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 英文書目

Kaufmann Daniel, Jeffrey S. Mckitrick and Thomas J. Leney (eds.), *U.S. Nation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85), p.5. 轉引自翁明賢 (2001)。〈突圍：國家安全的新視野〉。台北：時英出版社。頁 44。

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p176. 2002

## 英文期刊

Confucius Institute Report,

<http://zsr.info/news/images/stories/usconfuciusinstitutereport.pdf>.

Huntington, Samuel, "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4.

Harrison David, *Geographic Magazine*, Oct. 2007.

## 網頁資料

Mayes, Carolyn P. *A Letter From Our Director General*. <http://www.hscb.org>. 2003. (閱覽日期：2013.4.8)

HSCB. <http://www.hscb.org>. 2003 (閱覽日期：2013.3.4)

- 人民網甘肅頻道。http://gs.people.com.cn/BIG5/183345/15775758.html（閱覽日期：2013.4.28）
- 王信賢。〈中共構建「和諧社會」的解讀與評估〉。《和平論壇》。2006年。台灣智庫網站。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p?webno=3333333733&webitem\_no=232（閱覽日期：2013.2.23）
- 王逸舟。〈國家利益再思考〉。《中國社會科學》，（2）。2002年。  
http://qkzz.net/magazine/1002-4921/2002/02/1604529.htm（閱覽日期：2013.3.5）
- 北大法寶-北大法律信息網。《國務院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2005年。  
http://www.zlx.gov.cn/gov/zhoulu/zhoulu678120\_show.jsp?Im-id=zhoulu678120&data-id=zhoulu678120926（閱覽日期：2013.3.3）
- 江澤民。〈江澤民訪美談 16 大重申「三個代表」與「作出戰略部署」〉。2002年10月24日。今日新聞網站。  
http://www.nownews.com/2002/10/26703-1367928.htm（閱覽日期：2013.3.2）
- 林寧。〈關注文化安全加強先進文化建設的思考〉。《理論月刊》，（6）。2004年。  
http://scholar.ilib.cn/A-QCode~aq200502003.htm1（閱覽日期：2013.3.5）
-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6/content\_2024232.htm。（閱覽日期：2013.3.5）
- 胡錦濤。〈中共十七大胡錦濤談話全文〉。2007年10月15日。Yam 天空-新聞網站。  
http://n.yam.com/cnyes/cbina/200710/200710015859058..html（閱覽日期：2013.3.2）
- 胡錦濤。〈美國耶魯大學演講全文〉。《人民日報》，2006年4月2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4322655.html（閱覽日期：2013.4.22）
- 李向國。〈論胡錦濤「以人為本」的「民本位」思想〉。《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08年06月12日。人民網。http：  
//theory.people.com.cn/BIG5/82288/83849/83857/7374564.html（閱覽日期：2013.2.28）
- 李建敏。〈中國傳統「和合思想」推動當代和平外交〉。2005年10月4日。

網易新聞中心網站。《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2004年。

[http://news.163.com/2004w07/12619/2004w07\\_1090289740413.html](http://news.163.com/2004w07/12619/2004w07_1090289740413.html) (閱覽日期：2013.2.3)

張志安。〈試論經濟因素媒體管理制度的影響〉。2002年。

<http://tecn.sina.com.cn/itile/2002-04-24/112973.shtml>. (閱覽日期：2013.3.26)

程美信，〈思想貧困的文化戰略----從孔子學院看中國軟實力〉。2012年。

[http://www.arthoop.com/news/201206/news\\_9d28de8ff9bb6a3fa41fddfdc28f3bc1.html](http://www.arthoop.com/news/201206/news_9d28de8ff9bb6a3fa41fddfdc28f3bc1.html). (閱覽日期：2013.4.24)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B2%BE%E7%A5%9E%E6%96%87%E6%98%8E%E5%BB%BA%E8%AE%BE%E6%8C%87%E5%AF%BC%E5%A7%94%E5%91%98%E4%BC%9A> (閱覽日期：2013.4.28)

學習簡報。〈尋找中國崛起的脊梁〉，第12期。2006年。

<http://www.acem.sjtu.edu.cn/upload/publish/img/1070301451480.pdf> (閱覽日期：2013.3.4)

中共推動文化體制改革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2年「十六大」至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前，這是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發展階段；第二階段為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到2007年十七大召開，這是文化體制改革思想理論化、系統化階段；第三階段為2007年十七大迄今，主要是文化體制改革思想深化階段。相關內容參見「十六大以來中央文化體制改革思想脈絡」，《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7/c\\_1221678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7/c_122167832.htm) (閱覽日期：2013.3.6)